

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 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 書寫語境*

王建國**

〔摘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季麒光（1634-1702），江蘇無錫人，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留下具有濃厚江南韻味的園林書寫，其中，〈寓望園／書齋八景〉詩堪稱〈臺灣八景〉詩之濫觴：本文揭櫫季麒光宦臺遊覽／視察路線及其〈寓望園記〉、〈書齋八景〉書寫，正分別構成後來〈臺灣八景〉之外緣與內因，而前此與稍後亦是康熙首度及二度南巡、駐蹕於江南園林中，且題詠不輟的時刻。凡此，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遊，正是清初兩條不約而同通往江南園林的重要途徑。某種程度而言，江南的中國園林及江南之南的臺灣園林皆經歷「春風又綠江南岸」——由「殘山剩水」轉變成為「青山綠水」的過程，而其如何藉由實際舉措與書寫產生此番變貌，又，中國江南園林帝景與臺灣江南園林地景之間，究竟生發何種微妙的語境與可能的辯證關係，甚或產生共同構築大清帝國新秩序的嶄新詮釋空間，皆為本文探索與掘發之重點。

關鍵詞：康熙南巡、季麒光、宦遊、臺灣八景、書齋八景、江南園林

* 本文初稿〈「春風又綠江南岸」——論清初臺灣堂構園林之書寫語境〉，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之「201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15年12月11日）。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審查意見，裨益論述更臻周延完善，特此申謝。

**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春風又綠江南岸」

清初中國與臺灣園林書寫，可謂皆經歷「春風又綠江南岸」——由原來「殘山剩水」轉變成為「青山綠水」的過程，而此可以康熙（1654-1722）所締造的「海晏河清」太平盛世作為切入點。唯就實際的歷史語境而言，「海晏」與「河清」可有如此交錯之對話：「海晏」係指清廷平定海外鄭氏王朝，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而開啟宦遊文人來臺之契機，「河清」則指涉中土之「河清難俟」，即黃河連年氾濫成災，故促成康熙本人六次親自南巡，進而得以順道飽覽江南園林風光。

本文即以「海晏河清」與「河清難俟」作為探索清初中國與臺灣江南園林面貌／變貌及其彼此互為脈絡肌理之重要時間因素與關鍵性轉折點，而本文所欲揭露之康熙首度南巡與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1634-1702）來臺宦遊正是清初兩條不約而同通往江南園林的重要途徑，其發生契機皆可追溯至清廷掃平中土三藩亂事及海外鄭氏王朝後之「康熙甲子春日」（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者實際發生的時間幾乎相互重疊或前後接續，¹故具有一定的共時性：康熙首度南巡期間，大抵也是季麒光由福建閩清渡海來臺之際，而康熙南巡幸駕曲阜闕里孔子故居，御賜「萬世師表」榜書懸諸大成殿（燬於文革期間），翌年下詔摹搨頒行天下文廟——包括全臺首學之文廟（今存大成殿內），²此際季麒光正在臺灣積極推動各項政務並展開文教相關工作。又，仔細深究可以發現：康熙首度南巡回鑾後，季麒光初抵臺灣，而季氏返回中土不久，康熙又再度展開南巡，故二者同時具有歷時性或連續性、交錯性，復且，就空間而言，季麒光宦遊臺灣可謂接續康熙南巡未竟之處，故也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尤其，康熙再度南巡之後，曾詔集以王翬³等人為主之畫師，前後以三年時間，

¹ 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再度南巡前，季麒光〈頌田介眉觀察用林奕善韻〉（四首之四）曾提及南巡，詩云：「蒼生禱祀屬斯人，帝遣南巡出海堧。」更可見康熙南巡與官員宦遊之肌理脈絡，見季麒光：《蓉洲詩稿》（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卷4，頁60上、下。

² 《諸羅縣志·卷5·學校志·學宮·宸翰》載云：「國朝二十四年，御書『萬世師表』扁，懸掛直省各府州縣文廟。」見〔清〕周鍾瑄、胡建偉編：《諸羅縣志、澎湖紀略》合訂本，《臺灣文獻叢刊本》（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69。

³ 王翬（1632-1717），字石谷，號耕煙散人、烏目山人、劍門樵客，晚年號清暉主人。清代山水畫「四王」之一，另三人為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乃江蘇常熟人，季麒光係江蘇無錫人，二人時代相當，且具有地緣關係，故推測季麒光對王翬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完成十二長卷之《康熙南巡圖》，描繪康熙皇帝由京師永定門出發沿途所經之州縣山川名勝古蹟（王翬主畫山川、樓閣及江海波濤等），對此，季麒光〈胡義人應制詩序〉亦曾提及《康熙南巡圖》，其云：「聖天子南巡狩命，繪圖以垂不朽，開館設局，義人首膺其選，召試養心殿，拔置頭等第二，准入御書處應事，復議于館中，揀選十人授鴻臚散官，俟圖成議敘，義人亦與焉。」⁴又，審視季麒光撰文稱許胡義人參與《康熙南巡圖》之繪製，可謂深諳「詩畫本一律」（蘇軾語）之理——其未嘗不也是推許胡氏能成功將康熙南巡詩文轉換成為畫作，茲觀其云：「以我之筆墨，貌山尚水，彷彿林木，而且為山寫色、為水寫波，為林木寫聲寫影，使烟雨晦明遠近隱現之態，無不從尺幅中呈露，非胸有真丘壑，未易喻其妙。昔人調作詩者，以山水為境，山水亦以詩為境。『澄江靜如練』、『齊魯青未了』，千古絕善粉本，豈尋常筆墨所能盡，故林泉木石一出于詞人之手，便繪寫生動，情貌俱靈。蓋本鏤聲鍊綵之心情，頓挫景物，著神于阿堵耳」，⁵而這不乏也是季氏撰寫個人宦遊來臺過程及其臺灣園林詩文最佳寫照——不唯如此，將來則是檢視宦遊文人〈臺灣八景〉與《臺灣八景圖》重要基礎。⁶

巧合的是後來范咸（1696-1771）《重修臺灣府志》（范《志》）也刊載了《臺灣八景圖》，而且，不論帝王南巡或官員宦遊都是先有詩再有圖，唯此不可忽略

⁴ 季麒光：〈胡義人應制詩序〉，《蓉洲文稿》（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卷2，頁18下。季麒光另有〈瓶菊和義人韻〉，見《蓉洲詩稿》，卷4，頁71。又，據《江蘇省錫金識小錄·卷之五·補傳五書畫》下「義人」項，載云：「胡義人善畫山水，嘗應莊親王召至京師。王石谷翬於邑中能畫者，獨推許義人，以為成家。」見〔清〕黃印輯：《江蘇省錫金識小錄（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305。

⁵ 季麒光：〈胡義人應制詩序〉，《蓉洲文稿》，卷2，頁18下。「澄江靜如練」與「齊魯青未了」，分別是〔南北朝〕謝朓（464-499）〈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與〔唐〕杜甫（712-770）〈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之詩句。

⁶ 宋代以降，中國古典園林與傳統繪畫發展愈形密切，大抵表現於兩方面：一、園林景觀成為繪畫的題材，二、畫論成為園林佈置的原則，如〔宋〕郭熙（約1000-約1087後）《林泉高致·山水訓》有（山景）「三遠」之說：「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筆者重新標示新式標點）見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修訂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第1冊，頁500。又〔宋〕韓拙《山水純全集·論山》廣續郭熙之說而有（水景）「三遠」之謂：「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烟霧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遠。」（筆者重新標示新式標點）見同本註，第2冊，頁628。

范《志》之前身：高拱乾（?-?）《臺灣府志》（高《志》）首度披露〈臺灣八景〉詩作，而審視高拱乾〈臺灣府志（誌）序〉云：「（今天下車書大一統矣）而斯誌適成。倘聖天子輶軒下採，詢及海隅，斯誌遂得入奏，以附大一統之末，為三代以來未有之盛事，是亦微臣之志也」，⁷顯見其有意以此呈給當今聖上作為御覽之用。職是之故，倘若《康熙南巡圖》代表帝王巡行之意義，則後來《臺灣八景圖》無疑也具有地方官員來臺宦遊之意涵，換言之，《康熙南巡圖》與《臺灣八景圖》，遙遙相契，共同構成大清帝國風景的有機語境。凡此，正裨益本文對於江南園林詩畫美學之對話與發明。

本文同時以個人新發現之臺灣最早八景詩作——季麒光〈書齋八景〉為主要討論對象，並側重掘發其時代語境。顧名思義，「書齋」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起居場所，「八景」則是錯落其間的八個小小景致，而此與後來主要由來臺宦遊文人遊覽及視察路線所形構「臺灣八景」兩處兼具自然與人文之風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唯肇因於「書齋」素來具有幽密伏藏之性質，故其隱蔽於園林之中，往往不易為人察覺，然仔細審視〈寓望園記〉（文）與〈書齋八景〉（詩）之形式與內容，可知「書齋八景」正位於臺灣道署園林「寓望園」內，一定程度上，「寓望園」與「書齋八景」之景致實彼此相承、互為表裡，而共同展現江南園林特色，尤其甚者，「書齋（八景）」可謂「寓望園」之集錦或縮影，故可以之管窺臺灣園林書寫的時代意義與美學意涵。

又，不論就形式或內容而言，季麒光〈寓望園記〉／〈書齋八景〉與高拱乾〈澄臺記〉／〈臺灣八景〉，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更進一步追索，則可知「寓望園」／「書齋八景」正是後來「臺灣八景」——「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之發源地，故〈書齋八景〉又為〈臺灣八景〉之濫觴。凡此，實已異於以往由「大八景」（府）逐漸轉向「小八景」（縣），再轉向私人園林八景發展之認識。復且，盱衡以往論者以為康雍乾三世（朝）之臺灣八景詩作，多有宇內一統、愜記皇恩浩蕩，進而思及如何經世濟民與化民之意調。⁸唯本文進一步追溯〈臺灣八景〉之源頭，則在〈書齋八景〉的園林書寫中，大抵已可見論者所稱述之內容，雖然

⁷ [清]高拱乾：〈臺灣府誌序〉，[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上冊，頁267、282-283。

⁸ 徐麗霞：〈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臺灣府八景」為例〉，《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印]，2010年），頁196。

如此，〈書齋八景〉仍偏重於個人小我（小天地），且顯係江南園林之縮影或倒影，而〈臺灣八景〉則標誌帝國大我（新天地）的時代意義。再者，本文從文人來臺遊覽及視察路線的「實證」觀點，提出對於臺灣八景詩作的嶄新詮釋視野——臺灣八景命名係「地名」+「風景」組合而成，因此深具「地以景傳」的現實性意義，一定程度上也澄清甚至解構了歷來論述臺灣八景詩作者，多有將其視為文人「想像」之看法——如今看來這更像是一種「想像」。凡此，在相關的研究上已具有一定突破性的意義。

準此而言，「春風」與「江南」各有其指稱，說明如下。「春風」明顯具有「春王正月」時間指涉及「皇恩浩蕩」之象徵，並實際揭櫫康熙「巡行」（大歷史）與季麒光「宦遊」（小歷史）兩項歷史現實及由此衍生兩條遊覽與視察路線：其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諸臣奏請康熙效法古代帝王封禪巡狩，促成其後來首度南巡。尤其，康熙因初次南巡飽覽江南山明水秀，此後念念不忘，故一再南下，後來不僅寫下一生六次南巡的紀錄，⁹留下諸多園林詩文，而且更在京師皇家園林中大興土木、仿造江南堂構園林。其二、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1621-1696）大敗鄭軍於澎湖，克塽出降後，經施琅上奏〈陳臺灣棄留疏〉，翌年春，臺灣首度納入清帝國版圖，並設一府三縣，清廷隨即派遣官員渡海來臺，其中，季麒光由福建閩清簡調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而在此荒野窮鄉經理擘劃並獎掖文教，留下諸多治績，同時也重新體驗並展開江南堂構園林書寫；而觀諸其云：「開四千年未開之土宇」¹⁰及「誠四千年以來未有之盛事也」，¹¹更見季氏宦遊來臺具有時空轉折上的重要意義：就時間而言，季麒光係清初首批派任來臺的官員，未來將有許多宦遊文人紛至沓來蒞止斯土，故其毋寧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就空間而言，臺灣作為清帝國的海外邊陲與新闢疆土，後來在宦遊文人與

⁹ 六次南巡時間分別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及四十六年（1707）。依當時清朝整體政治情勢及實際造訪江南的時間、頻率而言，可將前兩次南巡及後四次南巡分為前後兩階段：蓋首度南巡是在平定三藩之亂與臺灣之後。二度南巡則是擊退沙俄對東北的侵略。又，二度南巡之後，因西北噶爾丹叛亂，康熙三度御駕親征，最終於康熙三十六年平定亂事。而如此區分之方式，與本文擇定《康熙南巡圖》（繪製於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後，乃前兩次南巡之結果）為討論範疇，前後具有一致性。

¹⁰ 季麒光：〈將軍侯生祠碑記〉，《蓉洲文稿》，卷3，頁12下。

¹¹ 季麒光：〈臺灣總戎楊公壽文〉（代李厚菴），《蓉洲文稿》，卷4，頁13上。

本土文人交互作用影響下，共同形塑出獨特的文學場域。「江南」歷來指稱不同地理範圍，唯明代之後，江南之稱大抵趨於穩定，論者以為應包括「八府一州」：蘇、松、常、鎮、應天（江寧）、杭、嘉、湖八府及由蘇州府劃出之太倉州，¹²且本文具有樞紐意義之「江南園林」也同樣奠定於明代，職是之故，本文「江南」指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遊皆曾蒞止之新「江南」，並且因此生發新／舊江南的總體修辭風格與感覺結構——其可謂同時指涉：一、清帝國收服舊有的江南地理空間。二、清帝國新附之地——臺灣府縣（江南之南）與清帝國首都——北京城郊（江南之北）皇家園林紛紛衍生、出現新的江南地理空間。三、新舊江南相互辯證而產生新的語境。值得一提的是，此中一定程度涉及文化史上「漢化」／「華化」¹³之重要議題：明代奠定的江南園林是漢族文人文化的重要表徵，而清初滿族帝王入主中原最終被漢化（本文以康熙為代表），另清初宦遊文人來臺，也一併將荊榛蠻荒的風土逐漸形塑成漢化（江南）山水，準此而言，清初無論朝（帝王）野（官員）所形塑的帝國書寫（不謀而合？），本質上都可以視為是漢文化的再生產或重新建構——大清帝國文明的新秩序可謂由此生發與傳衍。

職是之故，康熙及季麒光可謂先後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前往「江南」之地：康熙遠從東北塞外來到江南——舊江南，季麒光則由舊江南前往江南之南——新江南，此中雖有位階層屬（皇帝／官員）、滿漢族裔（滿人／漢人）及空間遷移（北京城郊／臺灣府縣）之不同，而分別形成「舊江南帝景敘事——康熙南巡及其中國園林書寫」與「新江南地景抒情——季麒光宦遊及其臺灣園林書寫」書寫差異，然詳加審視則可進一步發現：帝王「巡行」與文人「宦遊」正是兩條異質同構與殊途同歸的遊覽與視察路線。乍看之下，這是兩條尋覓江南園林的不同途徑，分別標誌清帝國政治中心的宏偉敘事（康熙南巡）與邊緣的細膩抒情（季麒光宦遊），且就個人情志表現及其書寫的相對意義而言，季麒光棹返時

¹² 歷來對於江南的界定，言人人殊。李伯重對於「江南」一詞的歷史演變有詳細的說明，其並從地理的完整性（同屬太湖水系）與經濟一體性，提出「八府一州」的看法。原題〈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刊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後經修改，作〈附錄一「江南地區」之界定〉，收入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年），頁419-432。又見李伯重：〈附錄：「江南地區」之界定〉，《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447-462。

¹³ 有關這方面的評述，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3-11。

或存在邊緣的野性與不馴，而稍流露出仕宦的矛盾複雜情緒及向中心秩序挑戰的緊張關係，但實際而言，二者卻彼此相互牽繫形構大清帝國的全新風景，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互相連屬而又不斷探索、審視異地／江南園林的過程。倘若賡續追索康熙巡行與季麒光宦遊的實際結果，將清楚得見舊北京與新臺灣（以臺灣府／臺灣縣為主）兩個地理空間接連出現嶄新的江南園林，這無疑是江南園林遞嬗發展的過程，準此而言，江南園林庶幾成為清初官方重要政治與文化認同的符碼，不唯如此，〈臺灣八景〉可謂〈書齋八景〉的延續與擴大，二者明顯具有題詠形式與內在肌理之延續性，且由封閉的書齋山水園林轉向開放的帝國山水園林。

唯此須再強調及說明的是，本文主要凸顯以下問題框架：在清朝「大一統」的共時性（時間上相近與相續）格局下，帝王巡行（康熙南巡）／「江南帝景」與官員宦遊（季麒光宦臺）／「江南地景」二者互為重要語境（大語境），具有「異質同構」的有機性脈絡肌理，故相互對照，除可見其底蘊異同外，也有助於相關議題的拓展與深化，如二者對於江南園林文化意涵的共同交集，對此，本文將賡續南巡與宦遊的語境，進一步掘發具有代表性的三篇園記：康熙〈暢春園記〉、季麒光〈寓望園記〉與高拱乾〈澄臺記〉（小語境），以明寓望園／書齋八景實為臺灣八景之濫觴，換言之，本文以為語境是最基本的前提，具有第一義性質，故擬尋求南巡與宦遊語境上的認識，闡述及發明二者在書寫上的可能性、必然性與相應話語，並進一步掘發其可能存在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對話與「潛文本性」（subtextuality）的詮釋空間。康熙南巡可謂「觀國之光」，而季麒光宦遊則是在臺灣納入清朝版圖的肇端性及時代性意義底下，代替天子跨海來臺治理及視察，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及特殊性意義，尤其，季麒光更為後來官員來臺宦遊奠定基礎並且樹立典範，故又具有相當程度的普遍性意義。

又，肇因於以往對於宦遊文人的描述，多只停留在一種簡單或片面的程式化敘述，而本文實際藉由「一統宇內」——中國與臺灣（新附之地）江南園林的觀察視野與角度，揭示宦遊文化的真實面貌及其後來相關文教活動實際推展的情形：康熙皇帝與來臺地方官員同樣以江南園林作為其政治及文化權力核心，且相較於當時臺灣的蠻荒處境而言，季麒光等宦遊來臺官員將江南園林遷移來臺灣，除了具有一種心理上的安定作用外，同時也代表清帝國文明的新秩序。凡此，可謂形構出一種極具詮釋意義的語境。

二、「帝景」敘事——康熙南巡及其中國／江南園林書寫

康熙首度南巡有兩個重要歷史背景。就遠的來說，順治二年（1645）接連發生「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造成江南地區騷亂動盪與杌隉不安。就近的而言，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先平定中土的三藩之亂，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接著討伐海外鄭氏王朝，完成收復臺灣，當下可謂「邀天庇佑，四海蕩平，萬姓樂業」，故「康熙甲子春日，有以時值上元，請行封禪及巡狩燔柴諸典禮者」，雖未獲聖聽，然因「惟是近畿郡邑屢經巡幸補助時施，而東南黎民風俗尚未周知」¹⁴而有南巡之行。舉凡：登泰山、曲阜祭孔、駐蹕江南、謁明陵、謁大禹廟（第二回南巡）……等一連串的舉措，實明顯具有安撫黔黎、攏絡民心及宣揚教化的象徵意義，且適值《清一統志》編纂年代，故更具大一統的宣示性意義。

康熙二十三年（1684）9月28日，康熙正式首度暫違兩宮，離開京師，扈從數百，浩浩蕩蕩，一路迤邐南下：10月11日至泰山，13日駐蒙陰縣，18日發宿遷縣並視察黃河北岸，23日抵維揚，11月1日抵江寧府雨花臺，11月2日祭洪武陵，11月4日發江寧府，泊燕子磯，11月18日至曲阜孔廟，至12月9日回宮。康熙首度南巡始末主要可見其〈南巡筆記〉，而其有如此之總結：「是行也，往返數旬，所歷山東、江南諸郡縣，日以周諮民隱，體察吏治為首務，行道之頃，復得覽其山川，憑弔古蹟，至於地方利弊，則將有以斟酌損益焉。率筆記之，示朕之不徒事遊豫也。」¹⁵可見雖以考察吏治民情為首要任務，然仍得以趁視察之隙飽覽各地名勝並遊歷江南山水。尤其甚者，倘進一步審視其各地實際停駐時間、整體敘寫篇幅比例及其詩作數量，可以發現江南為南巡主要之行程。又，雖然康熙前後六次南巡，其主要目的皆在視察與整治黃淮河務與漕運，如首度南巡〈闕河堤作〉即云：「防河紆吁食，六御出深宮。緩轡求民隱，臨流歎俗窮。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勞意，安瀾早奏功。」¹⁶然審視其歷次南下的時間，除了首度南巡之外，其餘多選在正月或二月自京城出發，而在二、三月左右抵達江

¹⁴ 康熙：〈南巡筆記〉，見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298-191上。以下康熙首度南巡之〈南巡筆記〉（〔初集〕卷20）及〈古今體詩三十四首〉（〔初集〕卷40）均徵引自此書，出版項略。

¹⁵ 同上註，頁1298-193下。

¹⁶ 康熙：〈闕河堤作〉，頁1298-318上。

南，正所謂「煙花三月下揚州」，復且康熙首度南巡時，雖然江南名勝甫因兵燹戰亂，多呈顯殘破荒頹的狀態，但仍絲毫不減其醉心程度，故一再驅使其玉輦南下，因此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其極可能繾綣眷戀於江南的明媚風光。

康熙〈南巡筆記〉稱述江南之文與衍生的相關性詩作，大抵可以概括為「敘事話語」與「抒情話語」兩部份，以下分述之。

(一)江南園林之敘事話語

「敘事話語」主要敘寫其遊覽江南經過與沿途所見所聞，此可依其所到之處標舉出「維揚（揚州）」、「蘇州」及「江寧（南京）」三個重要地理位置，此三地幾乎含括江南重要景致，其不僅各自擁有名勝園林，且由其地向外擴散，更形成江南大三角（大江南），而此正是康熙江南園林書寫之基礎。然不可諱言的是，康熙初抵廣義之江南，所見竟（盡）是一片「水鄉澤國」：

十八日（中略）渡河，舟行過清江浦，淮安府商賈往來舟楫如織。寶應縣、高郵州、邵伯鎮皆以湖水汎濫未復，故道居人草屋臨流，床竈半在水中，朕甚憫焉，登岸步行十餘里，親察水勢，召集耆老秀才細訪其故，皆云自海口壅塞，水無所歸，二十年來田畝已成巨浸，賦詩紀事，思所以拯濟之。¹⁷

淮安府舟楫之利與其周邊州縣汎濫成災成為強烈之對比，滿目瘡痍卻束手無策的窘迫景狀，誠可謂「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¹⁸唯卻莫可奈何。而召集當地耆老秀才共商對策，極可能是其此行中最接近百姓的一刻。「二十年來」云云與其登基年數一致，頗有「罪在朕躬」之意。康熙另有〈高郵湖見居民田廬多在水中，因詢其故，惻然念之〉：「淮揚罹水災，流波常浩浩。龍艦偶經過，一望類洲島。田畝盡沉淪，舍廬半傾倒。粃粃赤子民，栖栖臥深潦。對之心惕然，無策施襁褓。夾岸羅黔黎，踉蹌進耆老。諮諏不厭頻，利弊細探討。饑寒或有由，良慚奉蒼顛。古人念一夫，何況覩枯槁。凜凜夜不寐，憂勤怒如擣。亟圖濬治功，拯濟須及早。會當復故業，咸令樂懷保。」¹⁹發抒其痼疾在抱之情。此需俟諸其至

¹⁷ 康熙：〈南巡筆記〉，頁 1298-191 下。

¹⁸ 〔戰國〕屈原：〈離騷〉，見〔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11 上。

¹⁹ 康熙：〈高郵湖見居民田廬多在水中，因詢其故，惻然念之〉，見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

江左之後，始對江岸風光有更深刻之體會與著墨。

1. 維揚：

康熙抵達維揚，乃見江南市井之繁華富庶與其間之山光水色。²⁰開頭所稱「市肆繁華，園亭相望」，可謂揭開江南園林體驗與書寫之序幕。康熙一路遊覽平山堂、天寧寺、金山、竹林禪院等地，不僅受到百姓夾道歡迎，也親率扈從探索美景。其中，平山堂是士大夫之堂構，天寧寺與竹林禪院係佛家清修之地，同為江南儒、釋人文風景，而金山之樓臺亭閣水石——飛閣、石峰、亭臺、洞天及水泉等，則是充分展現江南自然風景，其中，又以留雲亭係金山最高處，亦是領略金山美景與俯瞰鎮江最佳之地，後因康熙來此登高眺遠，並題字「江天一覽」，遂名「江天一覽亭」，其意正謂「一覽無遺」，而此無疑是康熙此趟巡行視察之基調與寫照。又，途中原擬由儀真至江寧府，唯因順風而轉舵至京口，而來去京口與鎮江之間，帝王威儀如有神助，可謂一帆風順，無往不利，尤其甚者，由丹陽至姑蘇，順水行舟，晝夜兼行三百六十餘里，更見稱心快意。

2. 蘇州：

康熙抵達蘇州文字主要呈現虎丘與錫山、惠山泉兩大遊覽景點。²¹前半段主要敘寫其由楓橋進入蘇州城西門，民眾承歡忭舞與呈獻賦頌之情況，較諸上一段百姓持香夾道景況，更為熱烈生動。稍後以虎丘風景為焦點，分別呈現其前後殊為迥異的自然風景與人文風景。後半段則以錫山及惠泉為主，後者因唐代陸羽（733-804）《茶經》中品定其為第二，故又有「天下第二泉」之稱。至此，可以發現康熙似乎對於泉水情有獨鍾，沿途多曾巡幸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名泉，如：山東濟南「趵突泉」、鎮江金山寺「中泠泉」及無錫惠山「惠山泉」等，甚或親嚐

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頁 1298-318 上。此外，康熙〈諭吏部尚書伊桑阿〉云：「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甚為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尚書薩木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見同本註，頁 1298-149。

²⁰ 康熙：〈南巡筆記〉，頁 1298-191 下-1298-192 上。

²¹ 同上註，頁 1298-192 下-1298-193 上。

及品評諸泉之高下優劣：以為惠泉不及北京玉泉。

3.江寧：

康熙描述江寧文字²²可視為康熙對於前朝歷史文化的親身體驗與感觸，亦係其與臣僚「探論古今興廢之跡」之延續，唯已從紙上談論轉為實際考察。尤其，江寧是明代初期江南的重要發源地，故諸如報恩寺、洪武陵、明故宮等明代建築林立，更代表明代之後所開啟的江南文化。康熙致祭明洪武陵（明孝陵）堪稱是對江南的最後的回眸與凝視，而此亦是江南之行的高潮，且其於孝陵之前行三跪九叩大禮，無疑令明遺老與士大夫極為動容，復且，下令整修明陵並題寫「治隆唐宋」碑文，更是對明朝及江南文化最深的致意，不僅一併消除歷史與政權的緊張對峙，也一舉泯除前此維揚與蘇州等地仍存在的物我對立。

凡此，進一步歸納康熙南巡對江南：「維揚（揚州）」、「蘇州」及「江寧（南京）」之內容，可以發現其大抵呈顯「正」、「反」、「合」三種「感覺結構」。²³一、「自然審美」的感覺結構：如：「實北地之所未有」、²⁴「江山之奇，未有逾於此者」，²⁵可謂完全以褒詞肯認江南是一道全新的風景。二、「人文批判」的感覺結構：如：「未若東北風俗之樸實耳」²⁶與「味較玉泉遠不相及」²⁷，係以微詞部分否定江南的奢靡與品味。三、「盛衰榮枯」與「成敗興廢」的總體性感覺結構：乃由前兩項內容所形成的統合性話語，且有以此顯豁我朝興起之積極性意義。

²² 同上註，頁 1298-191 下-1298-192 上。

²³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提出「感覺結構」，就方法論的意義而言，是一種出於意圖理解某個世代或某個時期關聯因素的文化假設。見雷蒙·威廉斯著，王爾勃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42。雷蒙·威廉斯曾對「感覺」與「結構」分別加以釋義，同本註，頁 141。又，感覺結構並被用以考察或描述特定時期文學作品中，人們對於當時現實生活所蘊含社會心理與價值觀的普遍感受，故感覺結構可以說是該時期的文化。而且，「對生活感知或體驗的差異，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差異，而它經常表現為民族文化差異或階級文化差異。」見趙國新：〈情感結構〉，收入趙一帆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年），頁 433。

²⁴ 康熙：〈南巡筆記〉，頁 1298-192 上。

²⁵ 康熙：〈金山并序〉，頁 1298-315 下。

²⁶ 康熙：〈南巡筆記〉，頁 1298-192 下。

²⁷ 同上註。

整體而言，康熙首度南巡除了因治河需要主動召集耆老秀才，而稍與百姓有近距離接觸之外，其他如：「百姓持香夾道，意甚誠敬」²⁸與「閱視士民觀瞻，莫不忭舞，有獻賦頌者」，²⁹則多是保持一定的距離，正體現其以「帝國之眼」——且多以「北地」眼光衡盱江南，如：蘇州奢華不如東北樸實、惠泉不如玉泉味佳等，尤其甚者，復藉由遠觀俯瞰方式，諸如登山（金山、錫山）、登城（鐵甕城、姑蘇城）及登臺（妙高臺、雨花臺、觀星臺）等「登高」方式——高瞻遠矚，而一併遠眺俯瞰山水景致、闖闖市井與黔黎百姓，凡此，可謂皆帶有一定程度帝國俯瞰視角（北方中心立場）的「東方主義」／「南方主義」，準此而言，康熙〈南巡筆記〉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宏偉敘事」。³⁰又，康熙南巡暫違兩宮定省，然途次之中，仍不忘進獻江南物產，如〈途次網得鮮魚，馳進兩宮，兼志思慕之誠〉與〈駐蹕金陵，以方物寄獻兩宮〉，皆可見其惦念北地親人之深情。

(二)江南園林之景物敘寫

「景物敘寫」大抵承接「敘事話語」的內容而來，唯對於江南時空初體驗有更深刻細膩的摹寫，又可依其水路及陸路行程區分「舟行水上」之動態風景與「足履勝蹟」之靜態風景。「舟行水上」主要順著當下水路行程展開，而由舟中瞻望江岸所見的江南水岸風光，並因順風駛船而呈顯輕快舒放之情致，多具有平遠近觀的書寫視角，「足履勝蹟」則指登岸徒步至園林尋幽訪勝之陸路行程，多呈顯一派閒適的靜態景致，而除了〈幸報恩寺〉：「鳳刹高懸上界燈，珠缸璧帶一層層」³¹係極少數具有高遠仰止的書寫視角外，其他皆為深遠俯瞰的書寫視角。整體而言，二者多以視覺描寫呈現江南風光。

1.舟行水上

康熙舟上之作，計有〈晚經淮陰〉、〈由儀真乘巨艦至京口〉、〈夜過丹陽〉及〈燕子磯夜泊〉四詩，幾乎是純然的寫景，其中，除了〈由儀真乘巨艦至京口〉

²⁸ 同上註，頁 1298-192 上。

²⁹ 同上註，頁 1298-192 下。

³⁰ 本文借用愛德華·瓦迪厄·薩伊德 (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東方主義」(Orientalism) 與讓·弗朗索瓦·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宏偉敘事」(Grand Narrative) 兩個概念。「東方主義」係指稱西方國家帶著本身的優越性，對近東、中東及遠東社會文化進行想像與負面的論述。「宏偉敘事」則指具有全面性、完整性與一貫性的主題敘事。

³¹ 康熙：〈幸報恩寺〉，頁 1298-317 上。

呈現江岸之日景，具有磅薄雄渾之陽剛氣勢外，其他三作則呈現淮陰、丹陽及燕子磯三處江岸夜景，而其雖因夜晚能見度有限，未能盡如白日恣情縱眺，然仍饒富江南含煙籠霧與虛無縹緲之況味與特色。

〈由儀真乘巨艦至京口〉有明顯之時間推移，可將其依時間之順逆，分為今來／「溯游從之」與古往／「溯洄從之」兩個部份，唯其非截然對立，而毋寧具有派生關係。前半段呈顯江上風光：「長江萬里開鴻濛，高檣巨楫乘濛濛。儀真京口路百里，掛帆瞬息凌長風。汀蘆洲樹看歷歷，波恬浪闊光融融。湍流直下入滄海，遠源上與岷峩通。山川斷續合雲霧，日月照耀浮虛空。舟行迅速疾飛駛，恍聞擊鼓馮夷宮。柁樓高據極觀眺，奇縱豁達舒心胷。」³²極寫戰艦如馮虛御風航行於波瀾壯闊的江水中，而得以飽覽沿途的自然風光，甚或藉由懸想示現上接岷峩下通滄海，並透過以虛寫實手法——恍若聽聞水府鼓聲而躍登柁樓縱目遠眺，擴大延伸原有視野。後半段則回顧漫長的江南人文歷史風景：「年來江漢罷桴鼓，河海清宴絕戰攻。舳艫閒繫沙岸側，水師捲甲懸長弓。羽葆南巡渡揚子，居安更念艱難功。」³³遙想當年金戈鐵馬，叫陣衝殺，而今偃旗息鼓，軸艫甲弓竟毫無用武之地，此即〈南巡筆記〉所稱：「沙船，江中戰艦也。自岳州長沙用兵以來，多得其力。今河海清宴，當時戰具僅供渡江之用，然安不忘危，朕於此時未嘗不念艱難用武之際。」³⁴可謂充分流露其弔古尋幽之情懷。

〈晚經淮陰〉係進入江南後所首見之江南夜景：「淮水籠煙夜色橫，棲鴉不定樹頭鳴。紅燈十里帆檣滿，風送前舟奏樂聲。」³⁵鴉鳴與樂聲錯落，頗有為舟艦催發送行之意。〈夜過丹陽〉云：「錦纜徐牽夜未停，遙天煙靄淡疎星。居人兩岸明燈火，早是輕帆過驛亭。」³⁶則見疏星與燈火相互輝映，共同點綴江岸。〈燕子磯夜泊〉則為此行最後所見的江南夜色：「巍峩一片江頭石，千載人傳燕子磯。疑有鼃鼃藏窟宅，時聞鐘磬出山扉。牙檣緩住寒煙淨，羽衛周連夜火圍。沙岸聲聲動行漏，蘆花深處雁驚飛。」³⁷起首揭示燕子磯之形貌與盛名，其與詩末稍露行藏最後驚飛而起之野雁構成生動的諧趣畫面。

³² 康熙：〈由儀真乘巨艦至京口〉，頁 1298-315 下。

³³ 同上註。

³⁴ 康熙：〈南巡筆記〉，頁 1298-192 上。

³⁵ 康熙：〈晚經淮陰〉，頁 1298-315 下。

³⁶ 康熙：〈夜過丹陽〉，頁 1298-316 上-1298-316 下。

³⁷ 康熙：〈燕子磯夜泊〉，頁 1298-317 下-1298-318 上。

2. 足履勝蹟

康熙南巡陣仗可由：「仙仗何嘗驚野夢，鳴鑼偶爾過幽棲」、³⁸「朕率扈從諸臣歷覽諸勝」、³⁹「華旗出林際，芝蓋停三陽」⁴⁰及「秣陵舊是圖王地，此日鸞旗列隊過」⁴¹等相關詩句窺知一二，凡此，更增遊歷興致與盛況。康熙初抵江南即諭大學士王熙（1628-1703）、學士孫在豐（1644-1689）、江南總督王新命（?-1708）、江蘇巡撫湯斌（1627-1687）隨行，造訪位於蜀岡上之平山堂，而其命名來由係取端坐堂上「（盧陵歐陽文忠構廳事于寺之坤隅）江南諸山，拱揖檻前，若可攀躋」⁴²之意，具居高臨下之象徵意義，〈平山堂〉詩云：「宛轉平岡路向西，山堂遺構白雲低。簾前冬暖花仍發，簷外風高鳥亂啼（下略）」，⁴³正坐擁江南鳥語花香與山光水色。

康熙遊覽江南勝蹟，雖不乏純粹寫景之作，如〈天寧寺〉：「小艇沿流畫槳輕，鹿園鐘磬有餘清。門前一帶邗溝水，脈脈常含萬古情。」⁴⁴有如一幅純淨的畫作；〈妙高臺〉起首即揭「好高驚遠」，並由遠而近俯察地理進而觀照內心：「臺高絕衆鳥，臨眺暢清襟。渺渺沙洲樹，青青遠岸岑。波濤巖下接，洞壑檻邊深。江水明如鏡，彌徵天地心。」⁴⁵〈竹林禪院在潤州城南竹徑數里〉可謂演繹「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意：「一徑入深竹，數里來上方。叢生巖磴密，枝拂雲煙長。華旗出林際，芝蓋停三陽。颯颯吹霜風，碧葉紛翱翔。山齋頗幽寂，萬籟含虛光。觸物感予懷，歌彼淇澳章。」⁴⁶〈錫山〉則寫山泉清澈，而與群臣共濯的情況：「朝遊惠山寺，閒飲惠山泉。漱石流仍潔，分池溜自圓。松間幽徑闕，巖下小亭懸。聊共羣工濯，天真本浩然。」⁴⁷凡此，皆可見亭臺、竹林、泉水等築構

³⁸ 康熙：〈平山堂〉，頁 1298-315 上。

³⁹ 康熙：〈金山并序〉，頁 1298-315 下。

⁴⁰ 康熙：〈竹林禪院在潤州城南竹徑數里〉，頁 1298-316 上。

⁴¹ 康熙：〈金陵舊紫禁城懷古〉，頁 1298-317 上。

⁴²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6，頁 377。

⁴³ 康熙：〈平山堂〉，頁 1298-315 上。

⁴⁴ 康熙：〈天寧寺〉，頁 1298-315 下。

⁴⁵ 康熙：〈妙高臺〉，頁 1298-316 上。

⁴⁶ 康熙：〈竹林禪院在潤州城南竹徑數里〉，頁 1298-316 上。

⁴⁷ 康熙：〈錫山〉，頁 1298-316 下。

的江南旖旎風光。

唯隨著後來登臨地點普遍多具有重要地理形勢與位置之意義，則愈發顯露其「君臨天下」的恢宏氣勢，茲觀〈金山并序〉云：「金山在大江中，南眺潤州，北臨瓜步，登陟其上，縱目千里，泱泱乎大觀也。」⁴⁸即點出其所在重要地理位置，又，詩云：「一覽江天勝，東南勢盡收（中略）登臨豁心目，浩蕩俯滄洲。」⁴⁹首句即緊扣其「江天一覽」題字而發，可謂氣象萬千，〈鐵甕城〉：「萬里晴江擁舳艫，城高鐵甕接康衢（中略）半面煙嵐雄北固，一方形勢控東吳。龍舟漫道巡行盛，多恐深居政未敷。」⁵⁰則以晴空萬里揭開遼闊的江面，並帶出該城雄據北固山，控扼東南半壁之地理形勢，唯值得注意的是，其不乏也有從原來俯瞰帝國山水逐漸轉變成為觀覽當地土俗民情與關注黎民蒼生的傾向，如〈試中冷泉〉云：「如能作霖雨，霑灑遍山川。」⁵¹頗有澤被天下之意，而〈吳閶〉云：「鳴鑾獨上高城望，巷陌遙通水寺斜（中略）聲教四方猶未訖，願將淳樸變繁華」、⁵²〈句容道上〉云：「江南經幾郡，民俗欲周知」、⁵³〈雨花臺〉云：「城郭參差見，樓臺遠近分。人家百萬戶，煙火盡氤氳」⁵⁴等詩，可知聲威教化與物阜民豐正是其念茲在茲者。

又，後來甚至出現〈虎邱〉與〈金陵舊紫禁城懷古〉等以朝代興衰的歷史詠嘆。無獨有偶，二詩一前一後透過黃昏意象進行歷史抒情。〈虎邱〉云：「小阜迴岡落照紅，長廊曲榭構西東。獨憐劔石潺湲水，霸業銷沉在此中。」⁵⁵此康熙俯瞰歷史深淵，肇始即以黃昏暮色寫闔閭霸業不再——劔池正是其身後埋劔處。〈金陵舊紫禁城懷古〉：「秣陵舊是圖王地，此日鸞旗列隊過。一代規模成往蹟，六朝興廢逐流波。宮牆斷缺迷青瑣，野水灣環剩玉河。治理艱勤重殷鑒，斜陽衰草繫情多。」⁵⁶康熙回顧前朝歷史，不禁有所感慨，雖然眼前所見盡是殘缺頹圮，但

⁴⁸ 康熙：〈金山并序〉，頁 1298-315 下。

⁴⁹ 同上註，頁 1298-315 下-1298-316 上。

⁵⁰ 康熙：〈鐵甕城〉，頁 1298-316 上。

⁵¹ 康熙：〈試中冷泉〉，頁 1298-316 上。

⁵² 康熙：〈吳閶〉，頁 1298-316 下。

⁵³ 康熙：〈句容道上〉，頁 1298-316 下-1298-317 上。

⁵⁴ 康熙：〈雨花臺〉，頁 1298-317 上。

⁵⁵ 康熙：〈虎邱〉，頁 1298-316 下。

⁵⁶ 康熙：〈金陵舊紫禁城懷古〉，頁 1298-317 上。

仍相當程度肯認明朝其所遺留下來的體制——「明／殷鑑不遠」，最後更以斜陽襯托一抹歷史深情。

經由上述分析，可對康熙筆下之江南有如此之理解及想像：江南是一偌大的園林（大江南），而座落各地之名勝景致則是小規模的江南園林（小江南），準此而言，江南實是一座具有「園中園」形製與特色的大型園林，康熙本人則不斷往復穿梭在各個園林之中，不唯如此，其更親自為各處園林勝蹟命名題字，留下諸多御筆字跡，乍看之下，雖然此無異於園林中常見之匾額，唯倘若匾額的作用是園林主人或建造者對園林景致所進行之高度概括，甚或是對於理想山水空間的投射，則康熙此舉並非僅是徒具形式的「到此一遊」而已，而是明顯具有正式宣示主權及「坐擁江南」的意味，並且代表江南嶄新時代的開始，此後江南人文風景的書寫，完全不能無視康熙御駕至此及其詩文題字所透顯的人文觀照，而正是在此基礎之上，江南園林可謂已由一般「地景」提昇到特殊「帝景」的高度。

而康熙南巡詩作中，諸如：〈金山并序〉：「江山之奇，未有逾於此者」⁵⁷、〈雨花臺〉：「江山恣遐矚，草樹出清芬」⁵⁸及〈幸報恩寺〉：「平臨下見諸天小，晴日江山萬里澄」⁵⁹等，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幾已成為其帝王專屬意義的「江山」字眼，恐非純屬巧合（「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乃是具有大清帝國錦繡江山或萬里江山的隱喻性質，倘若「江山如畫」，則其命名題字實有「畫龍點睛」的意義，加上康熙本身即是龍的象徵——「來龍」為江南山水點睛，無疑具有開眼及大開眼界的實質性意義，換言之，江南實兼具康熙個人帝王新風景與帝國新山水的雙重意涵，且其當下頗具開闊氣象之題字，無疑也是此刻大清帝國盛世的象徵。整體而言，隨著康熙愈往南行，則愈見「山」——「來龍」、「水」——「去脈」和諧共構與交相輝映。

此外，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再度南巡，無疑最符合本文「春風」之意義。觀諸二度南巡相關詩題，諸如：〈謁大禹廟〉、〈登臥龍山越望亭〉、〈雲栖竹樹甚茂，幽蘭滿山〉、〈虎跑泉并序〉、〈靈隱寺〉、〈飛來峰〉、〈諭浙省將吏軍民並序〉、〈舟中書懷〉、〈將遊華山以欲雨未往〉、〈雨中幸錫山園林〉、〈惠泉〉、〈無錫小民以羔羊、惠酒爭獻，御舟笑而遣之〉、〈句容雨望〉、〈巡

⁵⁷ 康熙：〈金山并序〉，頁 1298-315 下。

⁵⁸ 康熙：〈雨花臺〉，頁 1298-317 上。

⁵⁹ 康熙：〈幸報恩寺〉，頁 1298-317 上。

幸江寧〉、〈賜江寧文武將士宴於教場〉、〈再過明故宮〉、〈江寧駐蹕並序〉、〈後湖〉、〈詠幽蘭〉、〈登報恩寺浮圖〉、〈上巳日再登金山〉、〈長江夜月〉、〈曉發維揚順風揚帆午餘已過秦郵〉、〈自宿遷解纜一日夜達山東境〉……等，可知其仍眷戀江南——大抵遊歷紹興、杭州、無錫、江寧與維揚等地山光水色，而後返棹北京，當中，除了紹興與杭州（西湖）以外，其餘多可謂舊地重遊。茲觀三首巡幸無錫——季麒光故鄉——所見與所感：

澹冶青山色，幽探傍曉來。煙籠巖下竹，雨洗石邊苔。斷續聽啼鳥，飄搖惜落梅。芻襟原浩蕩，隨意坐亭臺。

寒雲覆樹昔年經〔下註：甲子觀惠泉在十月〕，再品山泉到此亭。春水一犁農事足，喜看膏雨徧郊坰。

自昔君門隔九閭，如何草野得攀援。多因愛此元元切，忘分公然學負暄。⁶⁰

前二首主要展現閒適隨意的一面，寫雨中之景（揆諸康熙、乾隆〔1711-1799〕分別六次下江南，每次必定造訪寄暢園，故〈雨中幸錫山園林〉當包含該處園林；詳見《康熙南巡圖》第7卷），尤其，煙雨濛濛中，更增江南春色；唯第一首末聯著墨個人身影（形神），而第二首在今昔對照下（雖然首度南巡時曾經批評惠山泉，以為其不及北京玉泉，然因其雅好品泉，故又再度造訪），極寫「沛雨甘霖」：恩澤廣被。第三首則寫百姓爭相來獻得以目睹聖顏（元元指百姓；負暄原指冬日曝曬取暖，後指向君王敬獻忠心），刻意展現親民、愛民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代首度纂修《無錫縣志》，特意將康熙三首詩作列在卷首（唯其部份用字與《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稍有出入），揆諸《無錫縣志·凡例》云：「茲編經始適奉 宸游，載錫 奎章，增華泉壑，然編列卷次，義有未安，故既恭冠藝文之首，而仍異其體製，揭之卷端，所以尊朝廷、彰盛事也。」⁶¹故可見康熙南巡之深刻影響。

總體而言，康熙南巡堪稱是一趟知性與感性體驗兼具的江南之旅，其對於江

⁶⁰ 康熙：〈雨中幸錫山園林〉、〈惠泉〉及〈無錫小民以羔羊、惠酒爭獻，御舟笑而遣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44），見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頁1298-733。

⁶¹ 〔清〕徐永言修，嚴繩孫、秦松齡纂：《無錫縣志》（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玉鑑堂藏書第二八一號」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第1冊，頁6。

南重要堂構園林及當地地理歷史文化掌故，可謂瞭若指掌也如數家珍；不難想像江南堂構園林可能因鼎革物換與兵燹戰亂而呈顯荒廢棄置的狀態（廢園），而因康熙南巡重新獲得官方一定程度的整理修繕與維護保存，並且可以預見南巡之後，將為當地挹注一股文化風潮——最明顯的，莫過於清代康熙南巡前後曾帶動一波江南造園與修園等園林活動暨文化活動的發展，茲以平山堂為例：

本朝康熙元年改為寺。十二年，山陰金長真鎮知揚州府事，舍人汪蛟門懋麟修復平山堂。堂之大門仍居寺之坤隅，門內種桂樹，緣階數十級上行春臺，臺上構廳事，額曰平山堂。時蕭山毛奇齡、寧都魏叔子、郡人宗觀及長真、蛟門皆皆有記。會太守遷驛傳道，十四年過郡，蛟門拓堂後地建真賞樓，樓下為晴空閣，樓上祀宋諸賢。堂下為講堂，額其門曰歐陽文忠公書院。（中略）本朝聖祖賜平山堂、賢守清風、怡情、⁶²澄曠四匾，上賜「詩意豈因今古異，山光長在有無中」一聯、「時和筆暢」四字，臨《定武蘭亭》卷、《梅花扇生秋詩》草書一卷，今皆石刻供奉山堂中。⁶³

清代以降平山堂因屢逢改建、擴建而愈見宏偉規模，可以想見其竣工之日名流薈萃之盛況：其非但一度成為毛奇齡（1623-1716）與魏禧（1624-1681）等明朝遺民賞遊雅集之地，後來，康熙屢次來此巡幸並御賜匾聯，更是當時文化上的一大盛事，換言之，康熙南巡可謂帶動江南園林新發展，並且賦予江南全新的歷史文化意義，此可能是其當初南巡時始料未及者。⁶⁴而這大抵也是臺灣堂構園林入清之後重要時代語境——清初宦遊文人紛至沓來，也為臺灣帶來一波江南堂構園林的新氣象。

三、「地景」抒情——季麒光宦遊及其臺灣／江南園林書寫

清代臺灣堂構園林——「臺灣八景」有兩個重要交錯的語境：一、臺灣八景

⁶² 康熙二十三年首度南巡親題「怡情」。康熙四十四年五度南巡親題「平山堂」與「賢守清風」。

⁶³ 見〔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卷16，頁378-379。

⁶⁴ 復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修留雲亭，後來，兩江總督曾國藩（1811-1872）將康熙所撰「江天一覽」四字刻於石碑上，並置於亭內。

可以視為清代宦遊文人來臺旅遊的路線與景點，並標誌清朝統治臺灣的實際範圍，且彰顯一種權力與觀看的中心，進而形構清帝國的海外新風景，故一定程度上代表並顯豁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二、臺灣八景與季麒光堂構園林有密切的關係，而此可就其〈寓望園記〉及〈書齋八景〉兩方面所透露的相關訊息加以探究，當中，寓望園〈書齋八景〉之形式與內容，不僅成為後來臺灣八景之濫觴，而且也可從而窺知清初來臺宦遊文人之實際生活寫照。

季麒光，字聖昭，號蓉洲，江蘇無錫人。清順治十七年（1660）舉人，康熙十五年（1676）進士，任職中書省，康熙二十二年（1683）5月補福建閩清（梅溪）縣令，充甲子科（康熙23年〔1684〕）福建鄉試同考官，同年8月6日由福建閩清縣移知諸羅縣，11月8日抵臺。⁶⁵季氏雅好詩文，在臺期間曾與明末遺老／野老沈光文（1612-1688）共同組成臺灣第一個詩社「東吟社」，大力提倡文教，獎掖後進，並且勤於政事，頗有治績，留有文牘《東寧政事集》。然在臺期間亦迭經丁憂奪情、喪妻之慟與賠累風波……等，康熙二十六年（1687）5月望日後棹返福州（三山）守制。著有《蓉洲詩稿》（七卷）、《蓉洲文稿》（四卷）、《三國史論》（一卷）及《東寧政事集》（一卷）等。

季麒光來臺與去臺皆有詩作，而此詩作是目前所見清初渡海來臺宦遊文人中堪稱是最完整翔實者，故不僅可以藉此審視清初文人宦遊之普遍性，而且可以之窺知其宦遊之特殊性——沿途所見風景與仕宦心境，進而可與康熙首度南巡相互發明，換言之，此一方面正凸顯宦遊與南巡之關係，另一方面藉由其宦遊來臺遊覽／視察路線揭示其正途經後來所謂臺灣八景，得以進一步點出季氏〈寓望園記〉／〈書齋八景〉與〈臺灣八景〉：〈澄臺觀海〉、〈斐亭聽濤〉之密切關係。

季麒光渡海來臺前，在閩清縣有〈將赴諸羅，同人以詩相贈，依韻漫賦〉云：「西掖花深辜綵筆，東瀛雲靜泛戈船。」⁶⁶分別以追溯示現與懸想示現寫其有愧過去供職內閣中書與即將啟程來臺時之心境，此後極可能走閩江南下到福州，〈怡山禪院謁海神天妃，次壁間汪舟次韻〉（二首之二）云：「渡海君恩重，空囊矢素心。」⁶⁷則可見其宣示此行宦臺矢志報效皇恩浩蕩之初衷。接著寫烏龍江（閩江在福州分流）的「水色」與南下泉州的「山光」，〈夜發烏龍江〉云：「蕭條琴

⁶⁵ 季麒光：〈詳請署印文〉，《東寧政事集》，頁83上。

⁶⁶ 季麒光：〈將赴諸羅，同人以詩相贈，依韻漫賦〉，《蓉洲詩稿》，卷4，頁31下。

⁶⁷ 季麒光：〈怡山禪院謁海神天妃，次壁間汪舟次韻〉（二首之二），《蓉洲詩稿》，卷3，頁15下。

鶴下寒江，水闊風高透小窗。半夜月明帆影落，烏龍潮勢控南邦。」⁶⁸、〈風阻虹山〉云：「重疊山光接大荒，孤舟客夢此難降。風聲半襍灘聲亂，幾點哀鴻在隔江。」⁶⁹二詩同樣都是寫景，但前後心境顯然不同：前者為月色有致、具有開闊氣象之純然寫景，後者以蕭瑟風景寫紛亂之心境，又，相較於前者「蕭條琴鶴」以虛寫實起筆，後者最末「幾點哀鴻」則是以實寫虛，尤其，孤舟、哀鴻前後對舉，益發彰顯流離失所與形單影隻之淒涼。

〈初下海船即事和韻〉為初下大海之作，詩云：「海光黯淡接山光，暫借輕風出大荒。萬頃雲濤愁眺望，一行詩思強徜徉。漫將舊卷酬經濟，敢繪新圖矢對揚。此去波臣辛苦甚，幾時逸興托滄浪。」⁷⁰揭露其極目遠望山光水色並徜徉於雲淡風輕之中，可謂一派悠閒，然而「愁」、「強」二字，仍明顯可見其內心之憂慮；而〈海船和韻〉則極寫身陷迫仄船艙的窘狀與同舟共濟的情誼：「漫向深艙曲折藏，不堪伸縮苦低昂。偃僂屈首如狐竇，偃仄容身若虬房。夜雨侵衣聽寂寂，炊煙迷枕看茫茫。同舟笑語如相隔，兀坐推衾話故鄉。」⁷¹〈五虎門⁷²阻風和韻〉則寫受阻於五虎門「石尤風」，不得不「看風使船」，而對前程心生感嘆：「五虎門高怒石尤，海王作勢滯行舟。空天鴉噪潮初落，遠岫雲涵樹欲浮。雨過野煙開嶂外，日寒殘照在山頭。無端宦況成飄泊，不盡悲涼付酒甌。」⁷³某種程度而言，隨著其重新將視角拉回到海面上，愈加可以強烈感受其整體基調隨著海象險惡與風雨加劇而有逐漸轉趨悲涼之傾向，即便最後雨過天青，然仍不免略顯悲涼，而且，宦況頻頻受阻，終竟衍成當下海上飄泊與預示未來乖舛命運。唯其頷聯與康熙〈晚經淮陰〉：「淮水籠煙夜色橫，棲鴉不定樹頭鳴。」可謂相映成趣。

舟行大洋之中，有〈順風出大洋和韻〉云：「一葉乘風破海潮，瀟瀟波浪倚天高。滿船生死檣身寄，頃刻安危舵尾操。聖主宣威誠莫外，微臣出牧敢言勞？」

⁶⁸ 季麒光：〈夜發烏龍江〉，《蓉洲詩稿》，卷6，頁17下。

⁶⁹ 季麒光：〈風阻虹山〉，《蓉洲詩稿》，卷6，頁17下。

⁷⁰ 季麒光：〈初下海船即事和韻〉，《蓉洲詩稿》，卷4，頁31下。

⁷¹ 季麒光：〈海船和韻〉，《蓉洲詩稿》，卷4，頁31下-32上。

⁷² 五虎門位於福州市東閩江出海口，因有五座巨大礁石，猶如「五虎守門」而得名。又，或謂五虎門與位於福州閩侯縣之五虎山遙相應：五虎山因其巍峨聳立，形似五虎雄踞，故名，其由北而南分別稱小虎、大虎、白面虎、岐尾虎（四虎並列北望福州）及回頭虎（虎頭朝南）。

⁷³ 季麒光：〈五虎門阻風和韻〉，《蓉洲詩稿》，卷4，頁32上。

何年重泛滄洲棹，再向金門賦玉鰲。」⁷⁴其一葉（孤舟）正是舟行大洋之形象，而身陷海潮的波盪中，雖有命在旦夕之虞，然字裡行間仍不忘聖上——此際，康熙正在南巡途中，鞠躬盡瘁之心可謂溢於言表，唯末聯仍一定程度表現出對於歸期的惶惑與不確定。俟諸其行在開闊洋面上，雖仍有驚悸與不適，但顯然已較從容不迫，故有更多的感發，〈舟行大洋〉云：

朝出五虎門，暮宿梅陵口。一日千里程，輕航快馳驟。風從東西來，帆檣隨所受。船在天上行，轉側愁反覆。榜人急叫呼，心悸魄亦瘦。屈伸非所甘，俯仰若有負。恍疑醉未醒，宛似病初瘳。日光晴黯黯，山色畫黝黝。層峯望如屏，連洲視如肘。渺渺扶桑雲，依約可相就。古來稱海王，龍螭窟宅舊。颶母鼓鯨宮，蛟女弄蜃白。縱使息烽煙，可服不可守。今也隸版圖，洪荒開未有。斥鹵有輸將，卉服尊元首。從此鞏外藩，普天一宇宙。⁷⁵

朝發五虎門，暮抵梅陵口，可謂風馳電掣，實乃出航以來難得的快語與快意，然而，船艙迫仄窄小，復受波盪、驚悸之苦，則又令人不快。某種程度上，舟行之域也正標誌清帝國之新海疆，尤其，「古來」與「今也」云云，正充滿成王敗寇與海內一心的帝國話語，其將臺灣視為鞏固清帝國之海外屏障，正凸顯普天率土的大清盛世氣象。

〈夜泊澎湖〉（和韋念南韻）云：「為問澎湖舊有山，當年設險此稱頑。秋風戰伐人何在，夜雨波濤水正潺。幾片降帆殘照外，數家炊火亂崗間。我來拭目頻驚眺，天自茫茫鳥自閒。」⁷⁶乃由歷史遠景寫起——隱約之間，仍可聽聞澎湖海戰聲影，並逐漸過度到當下時空與眼前的自我觀照，昔之不復與今之寥落，形成一定的反差，而詩末「我驚」與「鳥閒」，則是一幅頗具諧趣的構圖。〈舟次土官謁見〉（和蒼崖韻）寫澎湖當地土官頂冠單褐、盤頭文項及短袴長衫來謁的形象，且由其描述復可見語言文化之差異：「暫解逢迎學頂冠，西風單褐不知寒。盤頭文項形容古，短袴長衫禮數寬。蠻語徐翻殊格格，番名細譯更難難。從今疾苦相珍重，一寸冰顏一寸丹。」⁷⁷而〈出洋和韻〉則是其再度離開澎湖時的情景與

⁷⁴ 季麒光：〈順風出大洋和韻〉，《蓉洲詩稿》，卷4，頁32上-32下。

⁷⁵ 季麒光：〈舟行大洋〉，《蓉洲詩稿》，卷1，頁11上-11下。

⁷⁶ 季麒光：〈夜泊澎湖〉（和韋念南韻），《蓉洲詩稿》，卷4，頁32下。

⁷⁷ 季麒光：〈舟次土官謁見〉（和蒼崖韻），《蓉洲詩稿》，卷4，頁32下-33上。

心境：「水接黃雲煙接天，蒼茫極望總無邊。空囊去國愁盈萬，垂老辭家路幾千。一葉西風悲斷梗，滿帆寒月任輕鳶。何當慷慨乘流志，不盡鄉心落照前。」⁷⁸此處思鄉情懷與悲涼情調，可謂隨著宦遊旅程漸行漸遠還生。〈海鷗和韻〉則是舟入臺江內海，即將入泊之作，唯其完全聚焦於海鷗，而由其翩躚飛舞出一片茫茫雪景，是此行之中難得閒適景致的書寫：「迎風逐浪一身輕，何事翻飛未許停。影入帆檣霜欲落，聲來衾枕夢還憎。雪衣片片隨波冷，紅喙殷殷帶血腥。羨爾忘機煙水外，寒潮羞傍暮雪聽。」⁷⁹此中，海鷗、帆幔與浪潮三者相互形塑，構成登岸前的海上美景。

揆諸上述季麒光詩文是目前所見清初來臺宦遊文人中，最早對於其個人宦遊途程加以翔實紀錄者，藉由其詩作已約略可見或隱約透露後來臺灣八景中六景的命名方式係「地名」+「風景」，如：西嶼落霞、東溟曉日、鹿耳春潮、雞籠積雪、安平晚渡及沙鯤漁火，又，倘釐清上述中的四景：西嶼落霞、東溟曉日、鹿耳春潮、安平晚渡，則大抵可知臺灣八景實為來臺與去臺必經旅行及視察路線。準此而言，清初來臺宦遊文人路線實已奠定後來臺灣八景之基礎，當然，此中不可忽略臺灣八景題詠者與其品秩官階及所轄範圍、掌管事務皆有一定關係。

倘若就文學傳統或文化傳播的意義而言，固然可以將「臺灣八景」直接視為「瀟湘八景」之遺緒，然而，如此一來毋寧無視臺灣八景的重要時代語境。如果進一步從堂構園林的地理位置與實際發展的角度出發，將可發現臺灣八景的兩大重要景點：「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符合「〔園林〕小地名」+「風景」），實際上正是在寓望園的構築基礎上蛻變而來，而寓望園的核心正是書齋八景，換言之，臺灣八景是從書齋八景向外延伸與幅射的結果，毋庸諱言，這是帝國新附的版圖，而誠如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探究《寓山志》時拈出「途徑與掩映——景象結構的導引組織」一小節，指出：「景象要素為具體的物質，景象導引的則為抽象概念，導引決定諸景象空間的關係，組織景面的更替變化，規定諸景展示的程序、顯現的方位、隱顯的久暫以及觀賞距離，

⁷⁸ 季麒光：〈出洋和韻〉（和蒼崖韻），《蓉洲詩稿》，卷4，頁33上。

⁷⁹ 季麒光：〈海鷗和韻〉，《蓉洲詩稿》，卷4，頁33上。又，《重修臺灣縣志·卷2·山水志·海道》載：「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蓋水禽陸棲也。近島嶼先見白鳥飛翔。」見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第1冊，頁59。另載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7。

剪輯諸景成為景象結構。景象必須通過導引才能使其要素成為有意味的空間，而成功的景象自身必也包含著導引。就景象要素作為觀賞形態的組織化而言，是途徑的作用；而同時相應地考慮觀賞點、觀賞程序的安排及其形態化，則是掩映的作用」；⁸⁰如果再從季麒光園林書寫的角度而言，可以發現就八景本身結構而言——不論是書齋八景或是臺灣八景，明顯是從其「園林結構——景象要素與導引的描繪」的「途徑與掩映——景象結構的導引組織」，重新還原或回到「自然與人工——景象要素的互相滲透」。⁸¹換言之，臺灣八景只有八個景象結構——具有個別的「自然與人工——景象要素的互相滲透」（內），而明顯缺乏「途徑與掩映——景象結構的導引組織」（外），個人以為此中「內實外虛」——八景之間是務實的，而其「途徑與掩映」則是蹈虛的——這正是清代宦遊文人來臺的旅行及視察路線。若然，〈臺灣八景〉及其具有根源性意義之〈書齋八景〉，皆是明顯以園林形式為基礎的「有意味的空間」。

以下，本文將賡續藉由「途徑與掩映」與「自然與人工」，分別詮釋「季麒光宦臺遊覽／視察路線——〈臺灣八景〉之外緣」與「季麒光〈寓望園記〉／〈書齋八景〉書寫——〈臺灣八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之內因」。

（一）季麒光宦臺遊覽／視察路線——〈臺灣八景〉之外緣

經由前述季麒光宦臺遊覽路線，大抵可以全幅朗現臺灣八景之梗概，⁸²尤其甚者，更有〈海行雜詩〉（八首）⁸³記錄其棹返路線與行程：先走安平，由鹿耳門出海，沿途停泊枯井澳與將軍澳，抵達廈門，再過安海，凡此，可謂完整呈現清初中國與臺灣單口對渡之「不二門」——廈門與鹿耳門，而依各詩詩末之自註：「風阻安平鎮」（其一）、「鹿耳門值破舟之險」（其二）、「再宿天妃宮」（其三）、「再宿鹿耳門海口」（其四）、「舟行三日不及抵澎湖，夜泊枯井澳」（其五）、「將軍澳守風」（其六）（按：守風即等候有利之風勢，裨益行船）、「將抵廈

⁸⁰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出版社，2006年），頁171。

⁸¹ 同上註，頁166-177。

⁸² 前此，萬曆三十年（1603）來臺之陳第（1541-1617）〈東番記〉即載：「從烈嶼（筆者按：小金門）諸澳乘北風航海，一晝夜至澎湖，又一晝夜至加老灣（筆者按：鹿耳門附近）。」〔明〕陳第：〈東番記〉，收於〔明〕沈有容、金雲銘著：《閩海贈言·陳第年譜》，《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27。

⁸³ 季麒光：〈海行雜詩〉（八首），《蓉洲詩稿》，卷3，頁20上-頁21上。

門」(其七)及「安海值風,至劉店登岸步行」(其八)等,可知其中途一波三折,如:鹿耳門舟破退返安平、中途未能收泊澎湖、涉險過安海……等。又,清初亦規定廈門與鹿耳門為中土與臺灣單口對渡,此中,澎湖為臺廈航程重要中繼點,其距廈門大擔門水程與鹿耳門水程分別為七更與四更,故其沿途當可見:「西嶼落霞」(澎湖)、⁸⁴「東溟曉日」(澎湖)、⁸⁵「鹿耳春潮」、⁸⁶「安平晚渡」、「沙鯤漁火」及「雞籠積雪」等六處天然景觀——唯實際而言,「雞籠積雪」(與「鹿耳春潮」相對)當在其未來視察路線之中,而進入「臺灣」後,則復可見「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兩處兼具自然與人文之景觀。當中,值得注意的是:「西嶼落霞」(澎湖)在臺灣的涵蓋範圍內,《臺灣府志·卷之一·封隅》稱:「臺灣府治(中略)西至澎湖大洋」,⁸⁷又,《臺灣府志·卷之三·敘川·海道》稱:「惟從澎湖來往為正路」。⁸⁸準此而言,臺灣八景庶幾可將其視為當時宦遊文人來臺或去臺時必經的旅行及視察路線。

又,臺灣八景之「澄臺」與「斐亭」係奠基於臺灣道署園林寓望園,故其本身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歷史人文意涵,又,其背山面海並朝向大清帝國的形勢,使主事者置身其中,可以回望來時路並寄託其思歸之情,復且,雖然由其命名形式:「寓望(園/亭)」轉變為園林實質內容:「澄臺」與「斐亭」,似乎已有淡化軍事色彩之意味,但其仍屬於道署園林,尤其,在整個臺灣八景所構築的地理形勢已由「點」轉為「線」、「面」的情況下,拱衛大清帝國疆土意圖反倒愈加明顯,故實質上仍具一定戍守帝國海外邊陲與形構臺灣政治、文化權力中心之意義,準此而言,其一方面具有來臺與去臺旅程終點與起點的巡行意義,另一方面則具有宣示帝國主權與海外新風景的統治象徵意義。職是之故,「澄臺」與「斐亭」

⁸⁴ 《臺灣府志·卷之三·敘川·海道》載云:「今之往來船隻必認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峙內或媽宮澳,然後渡甘吉洋,凡四更,船至臺灣,則澎湖三十六嶼又臺灣之門戶也。」見〔清〕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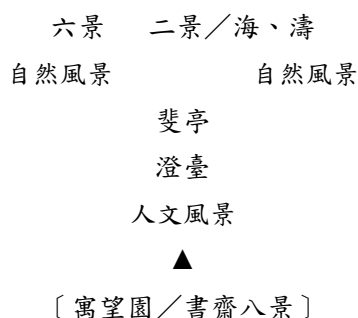
⁸⁵ 個人以為「東溟曉日」係來臺宦遊文人於澎湖停留一夜後,翌日清晨出發時所見海上情景,見王建國:〈風景與心境的鏡像:日據時期新詩中的海洋書寫——以林修二之詩為例〉,《文與哲》第18期(2011年6月),頁657、667-668。

⁸⁶ 《臺灣府志·卷之三·敘川·海道》載云:「臺灣本地南北海道,自鹿耳門北至雞籠、淡水十九更(下略)。」見〔清〕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44。

⁸⁷ 同上註,頁21。

⁸⁸ 同上註,頁44。

堪稱是八景的重心與中心，而與之相應的「觀海」與「聽濤」也具有「觀」與「聽」互文見義的「通感」(synesthesia)美學效果，可謂極具耳目視聽之義，不僅本身形成人文與自然相互交錯的景致，且以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為控扼中心向帝國擴散輻射，並與其他完全呈現自然景致之六景相互毗鄰，共同形成帝國海外的新風景。凡此，構成如下的風景美學：



相較其他六景多為天然美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屬於(半)人工美景——其不只是八景的輻湊中心，也是八景之中最具人文氣息與文化權力象徵者，而二景所揭示之「亭」與「臺」是清初園林中極重要的建築美學元素，其表面具有園林性質(「澄臺」與「斐亭」本身即是園林之屬)之內向性，然詳加細究則可以發現其連屬之海、濤，具有相當的開闊性，乃以往傳統江南園林所未見者，故其不只有更加廣闊的視野，且由此同樣環繞於臺江內海與臺灣臨近海域(裨海)而展開其他六景——就其整體形式而言，也可視為園林的延伸，故可將其視為園林由內向性向外向性轉變的關鍵。

無獨有偶，季氏詩文中所描述之北園(前朝舊園)與寓望園(國朝新園)皆可遠眺臺江內海——準此而言，個人以為寓望園或有意模仿甚至取代北園，尤其甚者，在寓望園的基礎上，後來更形成臺灣八景——其中，〈寓望園記〉更明白揭櫫「安平勝狀」，其代表的意義有二：一、彼岸「安平勝狀」的風景，可以視為後來「安平晚渡」之濫觴，而原來此岸的園林景致未來也將由「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加以取代。唯此有一關鍵性的問題：雖然清初臺灣園林以中國江南園林為基調，然因臺灣擁有臺江內海的天然景致，而賦予其「因地制宜」之契機，故某種程度而言，「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正是園林「借景」美學發展之極致，

⁸⁹復且，從「寓望（園）」而「澄臺」、「斐亭」命名的延續與轉變，可知其已明顯降低拱衛邊疆的軍事色彩，而增加實質性園林美學的意涵——「澄臺」與「斐亭」可謂拓展園林於無形。二、清初臺灣園林書寫逐漸式微之際，也是臺灣八景詩作逐漸浮出檯面之時，準此而言，頗可以將「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視為臺灣園林的擴大與延伸，甚或是清初臺灣園林暫時式微過程中的替代性風景——俟諸乾隆年間才又得見官方所修築之園林：乾隆三十年（1765），臺灣知府蔣允焄（?-?）於府署西側四合亭（雍正年間，「四合仙梁」〔郡圃榕梁〕為臺灣八景之一）址擴建「鴻指園」，又，乾隆五十七年（1792），南投縣丞翟灝（?-?）於縣署之西修建「聚芳園」，始復見園林之屬的「聚芳園八景」。

綜上所述，臺灣八景可以視為清初宦遊文人旅行路線與江南園林雙重語境下之產物，尤其，「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更是園林的直接擴展與延伸，又，雖然園林與臺灣八景先後都成為清帝國海外的風景，唯毋庸置疑的是寓望園明顯已具備臺灣八景的重要元素，且有面向臺江內海的在地濱海本土性特色，再者，相較而言，清初園林之內向性大於外向性，而後來的臺灣八景則是外向性大於內向性，故可謂間接擴大了園林景觀的視野，同時象徵清帝國海外新秩序的擴張與延伸，不唯如此，當臺灣八景成為來臺宦遊文人的必經路線時，無形之中等於擴大了書寫的可能性，故後來園林書寫式微時，臺灣八景乃躍居書寫之大宗。唯此有關園林與臺灣八景關係之論述仍屬於外部關聯性的說明，而真正內部的深刻聯結，則在〈寓望園記〉與〈書齋八景〉之密切關係。

（二）季麒光〈寓望園記〉／〈書齋八景〉書寫——〈臺灣八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之內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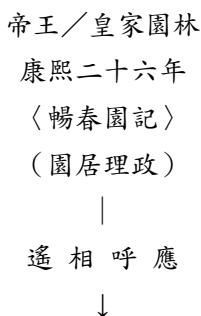
康熙〈暢春園記〉、季麒光〈寓望園記〉與高拱乾〈澄臺記〉三文，無論就時間序列、園林文化的體驗與社會集體性心理、甚或其可能蘊含的語境而言，彼此深具結構性關係與脈絡上的意義，可謂南巡與宦遊的延伸，一方面，這具有中國明清江南園林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季、高二文也充分展現臺灣江南園林的特殊性，復且，二人言必稱「聖上」——前此季氏宦遊詩文中可見「聖祖」、「君

⁸⁹〔明〕計成（1582-1642）《園冶》載云：「夫借者，林園之最要者也。如遠借、鄰借、仰借、俯借、應時而借（筆者按：所謂「應時而借」，如四時、晨昏……）。」見〔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臺北：崇智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頁247。以下《園冶》均徵引自此書，出版項略。

恩」、「主恩」話語，高氏〈澄臺記〉亦稱：「惟天子德威遐被」，⁹⁰顯見這是一套清初由上而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權力控制及運作模式。以下，將廣續探索此(小)語境，進而探本溯源論析季麒光〈寓望園記〉／〈書齋八景〉——〈臺灣八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之濫觴。

康熙二十六年(1687)，暢春園落成，該園乃康熙首度南巡之後，於北京城郊清華園舊址，仿江南山水園林(寄暢園)所構建者。這是康熙皇帝首座離宮御園(苑)，同時也是清朝「三山五園」皇家園林之肇端，後來康熙一生時間多駐蹕於此，而形成「園居理政」之傳統，這也是後來歷朝清帝「避喧聽政」與「寧神受福」的重要場所。唯此園林建制與形貌實不只出現在首善之區(中央)的北京，前後也出現在新附之地(地方)的臺灣：寓望園與澄臺／斐亭，換言之，中國與臺灣江南堂構園林不僅具有重要文化象徵的意義，也是大清帝國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中心——康熙以暢春園為主，來臺宦遊官員則先後以寓望園與澄臺／斐亭為主——此可以視為來臺宦遊之折返點：來臺之終點與去臺之起點。

康熙暢春園(御筆〈暢春園記〉)屬於帝王／皇家園林，周昌(??)寓望園(季麒光代筆〈寓望園記〉及〈書齋八景〉)與高拱乾澄臺、斐亭(高拱乾親筆〈澄臺記〉及〈臺灣八景〉)屬於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官署園林；準此而言，康熙〈暢春園記〉可以視為康熙首度南巡的結果，前可與季麒光〈寓望園記〉及〈書齋八景〉發明，後則可與高拱乾〈澄臺記〉及〈臺灣八景〉相較，三者之形式與內容遙相呼應(垂直縱軸：君臣上下)且前後相承(水平橫軸：時間先後)，構成深具意義的語境，而堂構園林對於清代帝王與地方官員的重要意義，亦由此可見一斑。茲圖示如下：



⁹⁰ [清]高拱乾：〈澄臺記〉，[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1138。

官員／官署（道臺）園林

| | |
|-----------|----------|
| 康熙二十四年中秋 | 康熙三十二年 |
| 季麒光〈書齋八景〉 | 高拱乾〈澄臺記〉 |
| 寓望園記／書齋八景 | 澄臺記／臺灣八景 |

前後相承

一般而言，臺灣八景書寫多以高拱乾為最早，⁹¹此乃明顯奠基於高拱乾〈澄臺記〉，唯〈澄臺記〉應為園記之屬，因此從季麒光的園林書寫到高拱乾〈澄臺記〉，前後不到十年的光景，臺灣的園林已有了明顯變貌。而盱衡上述圖示可知其接受來源有二：一、康熙〈暢春園記〉（間接）；二、季麒光〈寓望園記〉（直接）。賡續說明如下。康熙〈暢春園記〉對於暢春園舊址規模及個人修築動機有清楚的說明：「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瀾瀾，匯於丹陵。汨汨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蓋神皋之勝區也。（中略）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⁹²因茲形勝，構為別墅，當時韋曲之壯麗，歷歷可考，圯廢之餘，遺址周環十里，雖歲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鬱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在。爰詔內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甃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宮館苑籞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昔亭臺丘壑林木泉石之勝，挈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惟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⁹³又，「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茲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中略）其軒墀爽塏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焉架以橋梁，濟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繚垣，如是焉而已矣。（中略）朕匪敢希蹤古人，媲美曩軌，安土階之陋，惜露臺之費。亦惟是順時宣

⁹¹ 連雅堂云：「臺灣八景之詩，作者甚多，而少佳構。余讀舊志，有臺廈道高拱乾之作，推為最古。」見連雅堂：《臺灣詩乘》，收入《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23。

⁹² 李偉（1527-1583），字世奇，別號毅齋，為明孝定太后之父、穆宗岳父、神宗外祖父。萬曆年間曾任武清伯，萬曆十年（1582）加封武清侯。李氏曾於北京海淀築有清華園，即後來康熙修築暢春園之址。

⁹³ 康熙：〈暢春園記〉（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33），見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頁1298-647。

滯，承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⁹⁴而這樣修築園林的動機與崇尚儉約的內容也同樣出現於高拱乾〈澄臺記〉：「古者，臺榭之作，誇遊觀而崇侈麗，君子譏之。若夫制樸費約，用以舒嘯消憂、書雲攬物，斯高人之所不廢，亦廉吏之所得為也（中略）惟天子德威遐被，重譯入貢，薄海內外臣民共享清晏之福。而余振綱飭紀，分揚清激濁之任焉；正己勵俗，有端本澄源之責焉。當風日和霽，與客登臺以望，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則斯臺比諸『凌虛』、『超然』，誰曰不宜？豈得以文遜大蘇而無以記之也。」⁹⁵高氏可謂完全承繼康熙話語，並分別從「吏治」（端本澄源）與「遣懷」（散懷澄慮）兩方面闡釋其對「澄」的看法與意義。

又，由季麒光〈寓望園記〉、〈北園記〉（代周又文憲副）、〈秋夜游北園記〉等園記對於當時臺灣園林活動的描寫，可知寓望園與北園早已成為來臺宦遊文人舒嘯消憂及攬勝雅集的重要場所，其中，又以寓望園與臺灣八景之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實具有深厚淵源，值得繼續追索。而不論是北園或寓望園所在瀕海地理位置，抑或後來由寓望園衍生的「澄臺觀海」、「斐亭聽濤」、「東暝曉日」、「西嶼落霞」、「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甚或「雞籠積雪」等，可謂皆與自然海洋密切相關，換言之，在新帝國形構的〈臺灣八景〉秩序中，「臺灣」幾乎處於於汪洋大海之中，而此豈不能忘情於海之表徵？抑或有何其他實質性之意義？同樣也值得繼續留意。

歷來臺灣方志對於寓望園與澄臺／斐亭之規制與沿革多有相關記載，如：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之二·規制·衙署附公館》，王禮主修《臺灣縣志·建置志·公署附公館》，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卷3·建置志·公署》，臺灣縣知縣薛志亮主修、謝金鑾、鄭兼才合纂《續修臺灣縣志》……等，當中，又以《續修臺灣縣志》最為詳贍，茲觀《續修臺灣縣志·卷2·政志·衙署》載云：

巡道署：在西定坊，西向。中曰敬事堂（「舊志」），其後堂曰鶴馴堂，右有廳曰「若濟」（俱乾隆五十三年，觀察楊廷理題，有跋）。署後有園，

⁹⁴ 同上註，頁 1298-647 -1298-648。

⁹⁵ [清]高拱乾：〈澄臺記〉，[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上冊，頁 1137-1139。

舊曰寓望園（康熙二十五年觀察周昌闢）；有亭，曰斐亭（康熙二十二年，觀察高拱乾建）。叢篁環植，翠色猗猗，故取衛詩有斐之義。每夏秋間，清風掠樹，竹韻璆然，與海濤聲相和答。亭雖屢圯，後亦屢修，且常易其故處焉。嘉慶四年，觀察遇昌修建。亭之右，曰澄台亦觀察高公建。台可觀海，升高曠覽，滄溟島嶼，悉入望中。故舊志所稱八景，有「斐亭聽濤」、「澄台觀海」之語。嘉慶四年，觀察遇昌題扁。（下略）⁹⁶

上述內容幾乎可以斷言寓望園與澄臺／斐亭具有前後遞嬗的關係，並可進一步將〈書齋八景〉視為〈斐亭聽濤〉之雛型，復且，〈書齋八景〉（〈其一〉）之「樓」與〈臺灣八景〉之「澄臺」／「斐亭」，皆為園林重要元素——「樓臺亭閣」之屬，故同樣具有江南園林人文美景的深刻性意涵。又，季麒光〈寓望園記〉稱：

公治臺一載，政治之暇，就署後築小室，中置圖史尊彝，玳瑁滿壁，珍賞盈几，庭前裸植花竹，盆魚拳石依約。西園南墅傍構一亭，顏曰「寓望」，取左史量有寓望之言，則燕間寂處，已不忘周防捍固之意也。復結艸作亭，顏曰「環翠」，以蕉陰竹韻依繞左右（中略）亭之右建一方臺，御遙天吞，大海浩浩湯湯，杳不知其涯際。天空海闊，而安平勝狀如在几席。⁹⁷

對於周昌書齋小室之陳列擺設及其庭園景觀多有一定的著墨，且進一步點出寓望亭／寓望園命名（頗有藉「寓望亭」寫「寓望園」之意），係典出《國語·周語》：「國有效牧，疆有寓望」，指邊疆（境）用以瞭望及送迎之樓館，可知其以臺灣衛戍帝國之意極為顯著。值得注意的是：登上該方臺則可以遠眺安平，而這無疑正預示將來臺灣八景「澄臺觀海」與「安平晚渡」之景致。職是之故，當下寓望園（清朝新園）已有取代北園（明鄭舊園；康熙二十九年〔1690〕，復改為海會寺）的態勢，尤其，俟諸斐亭／澄臺竣工後——「臺灣八景」中，除了「雞籠積雪」遠懸北地外，其餘七景幾乎涵蓋明鄭主要統治勢力範圍，而今盡皆成為清帝國新空間。茲觀高拱乾〈澄臺記〉云：

⁹⁶ [清]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第1冊，頁86。個人以為「康熙二十五年」，應作「二十四年」；「康熙二十二年」明顯有誤，應作「三十二年」。

⁹⁷ 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4下-15上。

臺灣之名，豈以山橫海嶠，望之若臺；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然厥土斥鹵，草昧初闢，監司聽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宴息之所，耳日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洩其懷抱；并所謂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峰光，亦無由見。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于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以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于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

98

對於澄臺的命名、意義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說明。澄臺可收眺望安平之勝——可見「安平晚渡」甚至「沙鯤漁火」的勝景，無形中不僅取代了可以遠眺安平的前朝北園，而且更有宣示大清新地理與新地標的重要意義：一、以往宦遊官員從海上所見之「直北」，現在則只是來臺的中繼站而已，接下來必須順著水道再往下（南）走，方能抵達新的政治權力中心；二、以（澄）「臺」、（斐）「亭」為中心，其他六景幾乎是由此延伸、幅射出去，而澄臺與斐亭也與四周自然景物互相滲透，形成一組兼具自然與人文的風景空間——當中，澄臺觀海（視覺）與斐亭聽濤（聽覺）相互交織，可謂深諳「園林巧於因借、精在體宜」⁹⁹之道，而且斐亭附近原有寧靖王朱術桂（1617-1683）一元子園亭，唯寧靖王殉國前捨宅為寺，此際已闢為天妃神宮（今大天后宮），故當下興建此新亭，也有取而代之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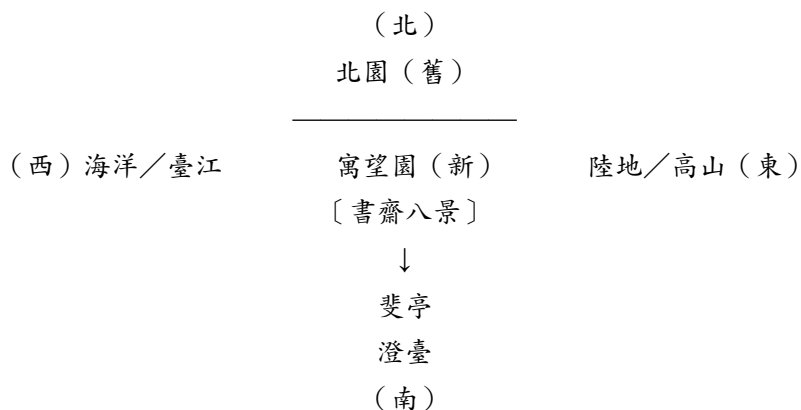
〈澄臺記〉對於「臺灣」的命名由來，也有極獨到精闢的詮釋：其分別對「臺」與「灣」加以釋義，並進一步凸出臺灣位於婆娑之洋——臺江內海的地理景觀，凡此，可謂以「臺灣」為「八景」定調——先主張對「臺灣」的話語權力，而後「八景」於焉次第展開，故對照臺灣八景詩作及其圖版，可以發現其完全聚焦於「沙曲水匯之處」，當然，「首當其衝」的正是臺灣八景之「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

以上關於寓望園（書齋）與澄臺、斐亭之關係，可再申說如下：一、觀諸臺

⁹⁸ [清]高拱乾：〈澄臺記〉，[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上冊，頁1137-1138。當中，「四省藩屏」云云，可謂承繼施琅話語：「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而來，見施琅：〈陳臺灣棄留利害疏〉，收入[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20·藝文一》，《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下冊，頁2480。

⁹⁹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47-48。

灣八景之「斐亭聽濤」圖版，可見寓望園書齋諸多景緻，如「臺山」、「石床」、「（月）竹」……等，後來皆由斐亭承繼延續下來。二、巡道署濱臨臺江內海，故設有高臺，且亭臺往往毗鄰而建，唯寓望園之高臺只可眺望安平，而澄臺似乎有後來居上之勢——姑不論其是否帶有誇飾修辭的成份，寓目可及四省迤邐而來之海上諸島風光，故氣勢更顯磅礴，尤其，「諸島往來之要會」及「海色峰光」云云，也一再透顯出本文所稱臺灣八景是宦遊文人來臺遊覽／視察路線的論述。三、〈寓望園記〉與〈澄臺記〉之形式與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與相似性，且完全以書齋小室與亭臺為其焦點，可以圖示其空間變化如下：



準此而言，臺灣八景中之「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二景，乃自寓望園／書齋八景中蛻變而出，而從「園」而「亭」、「臺」的命名轉變，一方面，保留及延續了以園林的命名方式，另一方面，不僅打通內部人文空間與外部自然風景——同時打破原有的封閉園林，走向更開放的園林，而且也充分展現江南園林的「借景」美學。

〈寓望園記〉載周昌「就署後築小室」，可謂深具江南園林宅園合一之特色，而季氏〈書齋八景〉正是「小室」錯落有致的八個小景，也是目前所見臺灣最早的八景詩作——時間實早於〈臺灣八景〉，故就「八景」云云，堪稱臺灣「八景」詩作之濫觴（前此已論及寓望園核心為書齋八景，包括其周邊亭、臺之建置，正是臺灣八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之前身），其詩題計有：〈月竹〉（詩

題下註：「為東寧門人翁鮒生（?-?）¹⁰⁰賦〈書齋八景〉，有序」）、〈架花〉、〈徑梧〉、〈簷馬〉、¹⁰¹〈盆魚〉、〈臺山〉、〈石床〉¹⁰²及〈壁烟〉，¹⁰³此八景詩題直是一幅兼具居住實用與遊賞審美功能的庭園造景——整體而言是聯屏集錦，分開來看則是各自獨立的佳構，徜徉其中當可收心凝形釋之審美況味。

唯遍查《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卻未見該序；個人以為〈寓望園記〉當即其序：雖然〈書齋八景〉與〈寓望園記〉詩文形式體裁不同，且指向兩件不同之事：前者為門生翁鮒生賦，後者則代憲副周昌作，但二者內容相關，不僅完全不相衝突，反而可以相得益彰，尤其，〈書齋八景·臺山〉提及：「南宮袖裏雲千疊，茂叔庭前月幾盤」，前者指米芾（米南宮，1051-1107），愛石成癡，後者則詠周昌先人周敦頤（字茂叔，1017-1073）有月岩（洞）讀書悟道，終而著成《太極圖說》——無獨有偶，季麒光也曾將北園之小室題為「致徹」，¹⁰⁴復且，「有序」云云，與「并（並）序」為一時之作有所不同（如本文所稱康熙〈金山并序〉），「并（並）序」一般與詩作同時並列出現，且多直接涉及與該詩作密切相關之人、事、物，而「有序」當是補述或追述之語，有重新交代或附帶說明之意，故此不僅符合〈寓望園記〉與〈書齋八景〉二者具有相對獨立的形式與內容，而且也符合〈寓望園記〉在前（康熙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公治臺一載，政治之暇，就署後築小室。」），〈書齋八景〉在後的事實（詳下）——此適可以進一步推定康熙二十四年中秋之前，寓望園即已竣工，而此際因受邀來此小室「歡度」中秋，同時得以為其門人賦詩，故季麒光以「有序」加以縮攝、合併敘述，實屬自然之事。

尤其甚者，〈寓望園記〉與〈書齋八景〉，詩文互見，有極密切的相關性與

¹⁰⁰ 沈光文〈東吟社序〉所列該社成員中，有翁輔生，名德昌，係福州人，雖未審二者是否為同一人，唯依「東寧門人」云云，可知其身份係季麒光門生，而再對照其於東吟社成員之排列順序僅在撰序者沈光文之前，推測其可能屬於晚生後學，若然，則二者為同一人的可能性極高。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卷22·藝文三》，《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2578。

¹⁰¹ 「簷馬」係指懸掛於屋簷下之鈴鐺，即「風鈴」。

¹⁰² 「石床」係指石製的坐臥器具。

¹⁰³ 季麒光：〈月竹〉、〈架花〉、〈徑梧〉、〈簷馬〉、〈盆魚〉、〈臺山〉、〈石床〉及〈壁烟〉，《蓉洲詩稿》，卷4，頁38下-40上。以下為簡省篇幅，不再贅記其頁碼。

¹⁰⁴ 季麒光〈北園記〉云：「蓉洲季子顏以『致徹』，蓋取吾家濂溪先生學士麟之以相況也。」見季麒光：〈北園記〉（代周又文憲副），《蓉洲文稿》，卷3，頁17下。

深刻的對應關係，此可以分為整體及細部兩方面來加以說明。首先，就整體而言，〈寓望園記〉開篇云：

園不依山則不古，園不依水則不靈，園不依喬枝古木，則不紆迴而盤曲。蓋（蓋）以人勝者，未有能成趣者也。若就方區員幅以寫其胸中之丘壑，其妙在於借景，而不在於造景。使觀者于此騁望尋探，應接不暇，儼若登高臨深，倚柯憩蔭，而不知其為亭前之疊石，臺下之繁花。此非園之能娛人，而位置結構（構）者，能引人入勝也。¹⁰⁵

一方面說明普遍園林的位置、結構與格局，另一方面也進一步點出寓望園依山傍水——「緣高丘之阻以作屏，鄰廣洋之險以面勢」¹⁰⁶之形勢：姑不論園林本身是否「房廊蜿蜒，樓閣崔巍」，然其確實「動『江流天地外』之情，合『山色有無中』之句」，¹⁰⁷完全符合士子「知水仁山」之心理，尤其，寓望園署後小室書齋八景之整體佈局可謂呼應「騁望尋探，應接不暇」與「位置結構」，又，揆諸〈書齋八景〉之書寫內容，正是季麒光〈寓望園記〉稱園林主人周昌寄情山水、花鳥的表現：「憲副周公千靈孕質，百韻羅胸，寄情花鳥，車轍所至，輒為山水點染眉目。」¹⁰⁸且其整體表現同時符合所謂「當風來奏響，月落呈姿，雲容天籟，與霓裳羽衣相賡合，真不啻渭川千畝，綠天萬樹矣」。¹⁰⁹

其次，就細部而言，如〈寓望園記〉之「花竹」與「盆魚拳石」，分別對應〈書齋八景〉之〈架花〉、〈月竹〉與〈盆魚〉、〈臺山〉，故小室即是書齋，乃至為明顯，而此也正符合《園冶·二·立基》之「書房基」所云：「書房之基，立於園林者，無拘內外，擇偏僻處，隨便通園，令遊人莫知有此。內構齋、館、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¹¹⁰《園冶·三·屋宇》云：「惟園林書屋，一室半室，按時景為精。」¹¹¹及《園冶·三·屋宇（三）齋》稱：「齋

¹⁰⁵ 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4上。

¹⁰⁶ 同上註。

¹⁰⁷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71。

¹⁰⁸ 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4下。

¹⁰⁹ 同上註，頁15上。

¹¹⁰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75。

¹¹¹ 同上註，頁79。

較堂，惟氣藏而致斂，有使人肅然齋敬之義。蓋藏修密處之地，故式不宜敞顯。」¹¹²不唯如此，這與後來臺灣八景之一——斐亭聽濤具有書齋功能，也有前後發展上的一致性。若然，則書齋正坐落於寓望園之幽深曲折與伏藏深密處，而此正是江南園林「曲徑通幽」特色——「景貴乎深，不曲不深」之體現。

又，依《蓉洲詩稿》的編排順序：〈書齋八景〉之前有〈中秋漫興（和斯菴）〉，故推測其應為乙丑（1685）中秋之作，此不僅符合〈寓望園記〉所稱周昌實際築室之時間，而且〈架花〉曾著墨「明月」：「卻看明月寒燈下，偏對疎烟暮雨時。」〈石床〉更直指「中秋夜」：「蕉陰青捲中秋月，燈影紅翻午夜香。」復且，〈月竹〉稱「夜午」、〈簷馬〉作「三更」、〈石床〉云「午夜」，而各詩之中：「客」、「月」、「燈」、「雨」、「煙」、「茶」等重要意象多互相涵攝，則又可見〈書齋八景〉為「一時之作」，尤其，「一鏡」、「一燈」、「一勺」、「一拳」及「一簾」更在整體空間上形成極具特色的「五一」書寫，其中，「一燈」呈顯文人「黃卷青燈」之書齋生活，而「千燈」云云則指中秋佳節「燈燭輝煌」。準此而言，季麒光乙丑中秋身在寓望園，丙寅中秋既望則在北園，故可知堂構園林是清初來臺宦遊文人重要時節出遊攬勝與流觴雅集的重要場所。

整體而言，〈書齋八景〉直如一幅「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¹¹³之構圖。〈書齋八景〉表面是一組靜態的詠物詩題，然審視其內容則多文人動態的園林生活，諸如著作：「三徑月明留客座，一燈雲臥著書天」（〈徑梧〉）、「入座蠻煙詩句好，到窗花色畫圖看」（〈臺山〉）；對奕：「詩成點筆燈前韻，子落棋枰雨後聲」（〈簷馬〉）；煮茶：「枝頭鳥韻香新雨，葉裏茶聲落晚煙」（〈徑梧〉）、「茶為詩成聲正細，香知客醉篆方斜」（〈壁煙〉）；吹簫擊筑：「短鋏孤樽因病老，吹簫擊筑傍愁聽」（〈簷馬〉）……等文人交往與閒情雅致的特寫；整體而言，則復揭櫫羲皇之世：「漫說松聲下石床，一簾風靜此羲皇」（〈石床〉）與桃源之境：「落陰閒淡容清嘯，依約桃源漾碧漪」（〈架花〉）之時空觀，而此亦是〈寓望園記〉本身所揭示者：「足以傲羲皇，排胥葛」¹¹⁴與「如柳河東之在永州，凡退山、石城、鈇鉞潭諸勝，俱搜取于青叢蒼莽之中，為天地開

¹¹² 同上註，頁 83。

¹¹³ [宋]蘇軾：〈永遇樂〉，見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上冊，頁 190。

¹¹⁴ 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5 上。

未開之靈秘」。¹¹⁵

顧名思義，〈書齋八景〉以寫景為主，且其純然書寫景物之作，多集中於〈寓望園記〉所謂「花」、「竹」與「盆魚」、「拳石」之屬，唯仔細推敲可以發現：愈到後來其以物抒情或借物言志的成份愈來愈濃。又，《園冶·卷3·八·掇山（一）園山》云：「園中掇山，非士大夫好事者不為也。為者殊有識鑒。緣世無合志，不盡欣賞（中略）是以散漫理之，可得佳境也。」¹¹⁶《園冶·卷3·八·掇山（五）書房山》復云：「凡掇小山，或依嘉樹卉木，聚散而理（中略）書房中最宜者，更以山石為池，俯於窗下，似得濠濮間想。」¹¹⁷可謂完全符合上述內容——包括〈臺山〉開端即云：「一拳結構傍書欄，綠雨青燈相向寒。」唯此書齋中之水石，非僅只是水石而已，而毋寧是大山大水的隱喻，即藉「疊山理水」——李漁（1611-1680）所謂：「幽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與木石居，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謂無聊之極思也。」¹¹⁸將廣闊的自然山水移縮於咫尺之地，揆諸〈盆魚〉與〈臺山〉末聯：「臨風已悟濠梁意，羨爾忘機問釣鈎」及「海外自慚情況薄，鬱林無石寄都官」，莫不具有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卷3·水石》所謂：「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安插得宜，一峯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筆者按：或謂「一拳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頃」）」¹¹⁹的審美效果，整首詩作也由單純的詠物寫景或寫實逐漸轉為寫意或寫境，而其由小書齋更得以窺見大園林，甚或更大的江南山水，故實可視為園林「小中見大」的極致表現，此正所謂「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¹²⁰之意。以下分別再就〈寓望園記〉所謂：「庭前裸植花竹，盆魚拳石依約」，稱述其在〈書齋八景〉中的細緻表現。

¹¹⁵ 同上註，頁14下。

¹¹⁶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209。

¹¹⁷ 同上註，頁211-212。

¹¹⁸ 〔清〕李漁：《閑情偶寄·居室部·山石第五》，收入李漁著，艾舒仁編次，冉雲飛校點：《李漁隨筆全集》（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151。

¹¹⁹ 〔明〕文震亨：《長物志》，《百部叢書集成：硯雲甲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第1冊，卷3，頁1上。

¹²⁰ 王闈運：〈圓明園詞〉，《湘綺樓全集》（三十卷），見《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上海：上海古籍，2010年），第723冊，卷8，頁254。

首先，說明「花」與「竹」的關係。〈書齋八景〉著墨「花」最明顯者，莫過於〈架花〉云：「小院沉沉花影遲，柔枝弱葉好攜持（中略）不羨錦茵迴舞袖，漫誇春檻醉歌眉」、〈石床〉云：「日暮柴扉搖細艸，樽深玉笛漾疎楊」、〈壁煙〉云：「柔絲愁染相如病，清縷輕縈杜曲花」；唯其整體仍以「竹」為基調，如〈月竹〉云：「石欄夜午遠烟空，月靜雲深竹影叢。最是渭川能醉客，更知淇水好歌風」，乃明顯延續〈寓望園記〉：「蕉陰竹韻依繞左右」及「真不啻渭川千畝，綠天萬樹矣」¹²¹云云，而此更加證明書齋與寓望園之密切關係；此外，〈徑梧〉云：「竹舍蕭閒靜可憐，高梧殘照笛床前」，〈壁煙〉云：「竹雲梧月即山家，領取閒情玩物華」，皆相當程度呈顯「不可居無竹」的文人風雅（「高梧殘照」與下聯「枝頭鳥韻」復有「鳳凰非梧桐不棲」之深意），此與後來高拱乾〈澄臺記〉云：「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以竹，遂以『斐亭』名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季麒光與高拱乾來臺任職有先後之別，然〈月竹〉與〈澄臺記〉同樣使用《詩經·國風·衛風》：「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¹²²之典故，一方面實可見其具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遺風餘思，另一方面也間接說明寓望園與澄臺之深厚地緣關係。

其次，說明「盆魚」與「拳石」的關係。〈書齋八景〉除了寫景之外，又有表現季氏個人宦情與心志者，其中，〈盆魚〉融攝外在風景與內在心境表現之極致，且在該組詩中明顯居於承先啟後的地位，全詩可謂流露濃厚自況意味，當最具代表性：「小有江湖總自由，青萍綠水任悠悠。閒知歲月涵空泛，靜得乾坤一勺收。細雨夜涼波影亂，晴雲花瘦藻香浮。臨風已悟濠梁意，羨爾忘機問釣鈎。」這是季麒光園林書寫中，難得一見道家境界的描寫：盆裡乾坤中，如魚得水，一派悠閒，字裡行間透露其對自然的嚮往，然此「相忘於江湖」終究只是現實的「倒影」甚或「幻境」罷了。

唯此實有必要深入其內中底層，發現照鑑風景內面的真實心境：〈書齋八景〉各詩末聯皆明顯流露當下之風景或心境，復且可見其景隨境轉者，而由其前後多有矛盾甚或與中秋佳節情韻不協者，則可進一步掘發其前後內在心境之轉變，就整體而言，實有「每況愈下」之趨勢。前此，〈月竹〉云：「為問南村攜手處，

¹²¹ 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5上。

¹²²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126-127。

登樓誰復舊嗣宗」、〈架花〉云：「落陰閒淡容清嘯，依約桃源漾碧漪」、〈徑梧〉云：「卜居何必江潭舊，仲蔚風流倍灑然」、¹²³〈簷馬〉云：「為問西鄰舊羈客，秋風吟嘯自關情」，皆可見其悠然自適之神態，又，〈月竹〉與〈簷馬〉接連使用「為問」、「誰復」等獨白與反詰意味濃厚之句式，無疑更增添蕭颯孤況之感。稍後，則將焦點轉向宦情書寫，〈臺山〉云：「海外自慚情況薄，鬱林無石寄都官」、¹²⁴〈石床〉云：「此中自許容高臥，閒賦停雲舊辟疆」，¹²⁵分別透露其作為「天涯倦客」之「故園心眼」¹²⁶——思念故鄉與親友之心理，唯〈壁煙〉云：「蹤跡飄零渾無賴，秋風獨樹夢偏賒」，更明顯寫仕宦生活之飄蓬斷梗，可謂充滿無奈與悲涼的孤況，從而加深「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之內情。某種程度而言，此是季麒光詩文中普遍存在的宦途之思，唯是否來臺之後——尤其，接獲訃告消息，更加深其深刻性，則有待未來繼續追索；然若僅就

¹²³ 〔漢〕張仲蔚（?-?），平陵人，擅詩詞，隱於嵩陽，所居蓬蒿沒人。陶潛〈詠貧士〉（七首之六）云：「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蓬蒿。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音，只有一劉龔（下註：李注：『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見〔晉〕陶潛撰，〔清〕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臺北：中華書局，1979年），卷4，頁8下-9上。

¹²⁴ 「鬱林石」係指陸龜蒙（?-881）「遠祖績（筆者按：陸績〔188-219〕）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見〔晉〕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96·列傳第一百二十一·陸龜蒙傳》（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第9冊，頁10下。弘治9年（1496），監察御史樊祉（1445-?）至蘇州視察，於陸氏故宅得見此石，下令建亭保護，並題名「廉石」，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蘇州知府陳鵬年（1663-1723）將其移入蘇州文廟府學內。見〔圖一〕。

¹²⁵ 晉朝顧辟疆（?-?）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辟疆園，「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唐時尚存，園址在今江蘇省吳縣。《世說新語·簡傲》曾載王獻之（344-386）造訪該園事。又，唐陸龜蒙〈奉和襲美二遊詩·任詩〉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前聞富脩竹，後說紛怪石（下註：竟陵子陸羽〈翫月詩〉云：「辟疆舊林閭，怪石紛相向」）」見〔唐〕陸龜蒙：《甫里集》（二十卷），收入〔清〕高宗敕纂，世界書局編輯部：《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第20冊，頁367-11。又，《唐詩紀事·卷40》之「陸鴻漸」項，載云：「吳門有辟疆園，地多怪石，鴻漸（筆者按：陸羽，字鴻漸）〈翫月詩〉云：『辟疆舊林閭，怪石終相向。』」見〔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鼎文出版社，1978年），下冊，頁643。

¹²⁶ 〔宋〕蘇軾：〈永遇樂〉，見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上冊，頁190。該詞原作「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本文所論詩文而言，此〈書齋八景〉與離臺前夕之作〈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明顯皆逢花好月圓時節而流露對於宦途的深刻思索，且更可能含藏痛徹心腑的「風木之思」。



圖一：陸續「鬱林石」，或稱「廉石」，今存蘇州文廟內。季麒光係無錫人，故極可能見過該石，其康熙 24 年（1685）中秋所作〈書齋八景·臺山〉也成為其來臺仕宦及去臺時之真實寫照。2014 年 8 月 1 日，作者拍攝。

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秋〈書齋八景〉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澄臺觀海〉／〈斐亭聽濤〉，雖然只有八年的時間，但不論就園林沿革或其書寫而言，都起了一定的變化。首先，就沿革而言：雖然〈書齋八景〉可能只是針對屬於草創階段的八個書齋小景緻所作的單純描寫，唯就其所在地理位置及其賡續發展空間而言，這八個景點與澄臺／斐亭可以說相當地接近甚或幾乎重疊，且其形貌與規模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斐亭本身即是一座小書齋的樣貌。其次，就書寫而言：雖然以詩題的命名、內容與風格而言，〈書齋八景〉接近晚明士人的山水園林傳統，而與後來〈臺灣八景〉的書寫傳統稍有不同。但這一方面說明了〈書齋八景〉是一方小山水，〈臺灣八景〉則是大山水，而不論何者，都與江南園林關係極為密切；另一方面則可見其以江南園林為基底的「（臺灣）八景」譜系發展變化情況：寓望園書齋八景／臺灣八景／縣邑八景／（聚芳園）園林八景。又，從〈寓望園記〉到〈澄臺記〉，可以發現文人雅集或集體出遊尋幽訪勝的盛況似乎已有逐漸消退的趨勢，而與此相應的是，從〈書齋八景〉到〈臺灣八景〉的題詠也有從集體性走向個人化的傾向——後來〈臺灣八景〉幾乎成為宦遊文人個人吟詠的孤獨風景，完全不見文友和答之形式；唯不論是高拱乾等來臺宦遊文人皆普遍題詠的〈臺灣八景〉，抑或是高氏個人特有的〈東寧十詠〉，都代表臺灣風景與風

物正進入一種新的帝國規訓秩序中。

四、結論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¹²⁷無疑也是清初文人重新造訪江南園林的最佳寫照。清初中國與臺灣的江南園林皆經歷了由「殘山剩水」轉變成為「青山綠水」的過程——此正意味（再）人文化：新帝國統治教化、馴服（化）了自然風土，而康熙「巡行」與季麒光「宦遊」實扮演其中極具關鍵性的角色——康熙南巡與季氏來臺宦遊正是兩條通向江南堂構園林的重要途徑。尤其甚者，康熙南巡考察各地吏治後，離開江南前夕，對朝廷命官諄諄告戒與殷切期許，作〈示江南大小諸吏〉云：「東南財賦地，江左人文藪。時巡歷此疆，民事日探剖。風俗貴淳龐，紛奢詎能久。澄清屬大吏，表率羣僚首。郡縣布慈和，愷悌歌父母。民者國之本，生計在畎畝。六府既孔修，三事安可後。教化默轉移，各須盡官守。戶使敦詩書，人知崇孝友。庶幾遠邇氓，皞皞登仁壽。誥誡申予懷，斯言慎不負」，¹²⁸可知其雖肯定江南富庶與人文薈萃，但對於充斥其間的奢靡之風仍稍有微詞。整體而言，可謂一套由上而下、充滿「富而後教」的官方話語，並諭示恪守官箴與為諸僚表率之為官之道，以期締造詩書禮教與克敦孝行之和樂社會，故可將其話語視為清帝國宦遊文人的普遍官守與基本法式。

本文主要凸顯康熙南巡（詩／文／圖）與清初來臺宦遊文人遊覽視察（詩／文／圖）——臺灣八景書寫之脈絡關係，雖然其所到之處不同、所見亦異，然卻同樣嚮往、沉醉且依歸於江南堂構園林，而「江南園林甲天下」，幾乎也成為有清大一統的重要政治符碼與文化象徵。當中明顯可見君臣桴鼓相應：康熙以其壯盛之齡，復逢海宇昇平年代，龍車鳳輦由北京迤邐南下，一方面進行實地視察，一方面遊覽水聲山色的江南風光，不僅明顯具有巡幸大清帝國疆域及彰顯個人治績之深刻蘊意，而且同時體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文人帝王形象，尤其甚者，康熙南巡實為後來清代宦遊文人樹立一定楷模典範與文化品味，故清代以降文人宦遊來臺皆應置諸康熙南巡語境下重新加以審視：一方面，康熙（滿族）以

¹²⁷ 〔唐〕孟浩然：《孟浩然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1上。

¹²⁸ 康熙：〈示江南大小諸吏〉，頁1298-317下。

帝王之尊南巡，除了對江南奢靡之風稍有微詞外，可謂極為稱許江南歷史文化，尤其，對於江南園林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不僅於北京清華園原址仿照江南園林（寄暢園）修築暢春園作為離宮，並陸續於北京西北城郊築構皇家園林，且此後南巡都一再趁著春光融融的煙花時節——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前後六度下江南，正是「能不憶江南」之具體呈現，而此除了展現其懷柔籠絡的政治手腕之外，另一方面也相當程度反映其最終為江南園林文化所馴化／漢化；另一方面，這批清代初期首度來臺的宦遊文人也先後在臺灣營造了深具江南特色的堂構園林，如：寓望園與澄臺、斐亭等嶄新的官署園林，當中，季麒光（漢族）正是扮演遊賞與書寫江南園林最具代表性者，尤其，季氏出身江南無錫簪紱世家，自幼深受江南園林文化薰陶，養成傳統士大夫美學品味，故宦遊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期間，對臺灣園林進行相關書寫，即不僅以此心理及眼光批評當時臺灣荒服之地理環境，而且也進一步為此地帶來一定的江南風尚，準此而言，從康熙皇帝到地方官員毋寧共同以江南園林作為漢化基底，從而締造了清帝國——海內及海外——文明新秩序。

又，某種程度而言，園林是自然山水的縮影，正所謂「咫尺山林」，故園林中模擬自然山水而綿延起伏、逶迤延伸的山水造景，未嘗不也是新帝國江山的隱喻，而此正是新舊「江南」相互辯證或再發展、再書寫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遊對於江南堂構園林的書寫，明顯可見季氏在江南之南——臺灣發現海外桃花源（「抑亦（臺灣）江山之助乎？」），然卻不見康熙有類似的描寫（至少在本文探索康熙前兩次南巡中皆如此），當中除了二人身份、族裔、位階、年紀……等主觀因素不同外（詳下），也不可忽略客觀地理環境的差異——一定程度而言，江南是一富庶之地，反觀，臺灣則是榛莽叢生、草萊初闢之地。職是之故，二人之園林書寫實互為語境，因此，江南／中國帝景與江南之南／臺灣地景也具有相互定義且互為表裡的辯證詮釋關係。換言之，清帝國江南園林乃結合帝景與地景兩種移天縮地書寫視角而形成之新天新地。凡此，康熙南巡實構成清初來臺宦遊文人重要語境，甚且，帝王巡行與文人宦遊正是奠定並構成大清帝國盛世的重要基礎。而在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遊的雙重交錯視域中，明顯可見帝王與地方官吏共同合力打造並書寫江南園林「感覺結構」——大清帝國新氣象與新風景。

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遊分別代表大清帝國帝王及其官吏所展開兩條嶄新的遊覽與視察路線——康熙南巡與季麒光宦臺對當事人而言，無疑皆是一段新奇的初

體驗，而二者雖然表面明顯「道不同」：康熙實際南巡時間長達兩個半月，又兼具濃厚視察與遊覽的意義，季麒光實際宦遊時間只有短暫數日，視察意義相對薄弱，或僅具遊覽之意義，而且其個人身份亦異：聖祖皇帝／地方官吏；神態形貌：氣宇軒昂、神色從容／惴惴不安、失魂落魄；巡行規模：扈從數百／隨從二三——就過程而言，二者明顯具有坦途與險途之別：康熙南巡可謂「一帆風順」，途中甚或可以隨時「見風轉舵」，故更見其快意，而季麒光來臺宦遊則是「看風使帆」：除了〈舟行大洋〉：「朝出五虎門，暮宿梅陵口。一日千里程，輕航快馳驟」，可謂迭經顛簸浮沉的疲憊、買舟無錢的窘困，甚或舟破檣折的驚心動魄……，加上沿途風雨交加，實可謂頻頻受阻、屢屢遭挫——「宦海浮沉」幾成為其來臺仕宦之真實寫照。但實際上卻可以「相為謀」：雖然二人詩文大抵呈現大我：帝王「中心話語」與小我：地方官吏「地方話語」之差異，唯「中心話語」向「地方話語」擴散，「地方話語」向「中心話語」聚攏，進而共同構成清帝國宏偉敘事話語與帝國全新風景，加上二人皆因此行而負有實際政治及文教任務，如：蠲免地方稅賦、獎掖提攜當地士子……，故堪稱「志同道合」者，唯康熙南巡正值而立盛年，因繾綣江南旖旎風光，故後來寫下六次南巡的紀錄，而季麒光來臺因致身苦晚且已屆天命之年，加以迭經丁憂、喪妻與賠累等風波，故愈到宦遊尾聲，其大我與小我之矛盾傾軋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凡此，可見地方邊緣書寫與大一統中心書寫可能存在緊張的關係。

尤其甚者，季氏此行毋寧對於仕宦生涯有更深刻的自覺與體驗，來時逕稱「宦況」（〈五虎門阻風和韻〉），去時復稱「薄宦」（〈再宿樓上〉）、「宦途窮」（〈海行雜詩〉〔其三〕）、「惜宦遊」（〈海行雜詩〉〔其七〕）云云，凡此，實與其在臺經歷親人、摯友相繼溘逝與個人身陷賠累風波有關，當中，依〈將發東寧自紀〉¹²⁹又知其對賠累事件最為在意，復且，棹返途中一再面臨：「無生死」、「身仍在」、「身不死」、「得生入」……等步步驚魂及各方生死交關的磨難與考驗，故字裡行間一再流露其消極負面的心理，整體而言，季麒光可謂來時飄泊——「宦況成飄泊」，去時也飄泊——「飄泊最關情」，唯來時路上有人同行，可以一路和韻，歸去時卻形單影隻，無人可與唱和，故詩句中屢屢透露孤獨況味，某種程度上，來去之間正呈顯對話喧聲（複調）與囁嚅獨語（單調）之強烈對比，尤其，來臺途中多見海鳥相伴，然去臺途中，不僅眾鳥隱沒，且「怯見」（鳥）

¹²⁹ 季麒光：〈將發東寧自紀〉，《蓉洲詩稿》，卷6，頁25上-27上。

與「愁看」(雲)(〈海行雜詩〉〔其七〕)，更深刻透露近鄉情怯與悔不當初——「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返」的翻然悔恨。

康熙南巡江南各地與季麒光宦遊途經澎湖海域或臺江內海，皆曾是明清兩軍對壘交鋒或雙方水師殺伐與調遣之重要場域。二人詩文對此間之歷史亦有一定程度之著墨，且最後多以歸入版圖或一統宇內之帝國宏偉敘事作為結束，唯此帝王南巡與官員宦遊兩種宏偉敘事之實際情形略有不同：康熙首度南巡可謂「一帆風順」，反觀季麒光則是「布帆微恙」——檣帆三變：檣折、檣聲緩、檣聲急，其無論來臺或去臺皆風波不斷而備受考驗，大抵而言：來臺之作多刻畫沿途風景，並相當程度展現大我家國敘事，而去臺之作雖前半段仍多以外聚焦書寫外在風景，然後半段則改以內聚焦發抒內在心境，且多有衍為小我個人抒情之趨勢，其中，更不乏老淚縱橫，如：「垂淚自憐還自悔」、¹³⁰「三年風雨淚沾衣」、¹³¹「三更獨客淚」、¹³²「逢僧淚轉空」¹³³及「三更淚已殷」¹³⁴云云，而寫其一路由安平淌淚哭喪返抵中土。換言之，風景書寫與心境書寫實相互涵攝，後來內心觀照更成為宦途風景的中心：風景成為心境的烘托，而心境則向外投射成為風景。王國維(1877-1927)云：「一切景語，皆情語也。」¹³⁵，豈此之謂乎？雖然表面而言，這是季麒光渡海紀實之作，然一葉扁舟(孤舟)、一葉浮萍，正是其行在大洋中的形象，而未嘗不也是人生如寄的象徵，甚者，往返途中皆深刻體驗宦海浮沉，而回程之中風雨晦冥，更加深宦途險阻，正如白居易〈贈吳丹〉云：「宦途似風水，君心如虛舟」，¹³⁶故就象徵意義而言，可將其視為一場兼具「宦海浮沉」與「回頭是岸」的內心風暴，而此幾乎造成帝國宏偉敘事塌陷與崩落。

江南堂構園林多以「詩」為題，以「畫」為本，前者如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云：「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

¹³⁰ 季麒光：〈將發東寧自紀〉(其七)，《蓉洲詩稿》，卷6，頁26下。

¹³¹ 季麒光：〈將發東寧自紀〉(其十)，《蓉洲詩稿》，卷6，頁27上。

¹³² 季麒光：〈海行雜詩〉(其一·風阻安平鎮)，《蓉洲詩稿》，卷3，頁20上。

¹³³ 季麒光：〈海行雜詩〉(其三·再宿天妃宮)，《蓉洲詩稿》，卷3，頁20下。

¹³⁴ 季麒光：〈海行雜詩〉(其六·將軍澳守風)，《蓉洲詩稿》，卷3，頁21上。

¹³⁵ [清]王國維著：〈人間詞話刪稿〉，見施議對譯註：《人間詞話譯註》(臺北：貫雅文化，1991年)。卷2，頁220。

¹³⁶ [唐]白居易：《白香山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78年)，第1冊，卷5，頁4下。

方稱佳構」，¹³⁷後者如謝赫（?-?）〈古畫品錄〉以「經營位置」（結構佈局）乃畫之六法之一所謂「謝赫六法」，¹³⁸又如計成（1582-1642）《園冶》論及「借景」時云：「夫借者，林園之最要者也。如遠借、鄰借、仰借、俯借、應時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筆先，庶幾描寫之盡哉」，¹³⁹蔣驥（1714-1787）〈讀畫紀聞·章法〉云：「山水章法，如作文之開合，先從大處定局，開合分明，中間細碎處，點綴而已」，¹⁴⁰而藉由鑿池引水、疊石堆山、植樹栽花、楹柱題聯……等建築工法與園林規劃設計，重新構築出具有「『詩』情『畫』意」——「無聲之詩」與「立體之畫」之自然人文景觀，故遊賞於園林之中，實無異於品詩賞畫，甚者，明清之際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的高峰，其與古典詩文、雕刻、書法及繪畫等藝術密切相關：廳堂陳列的書畫可能是園林主人個人雅好、品味與才學（華）的展現，而匾額、楹聯除了具有點景、寓意或標示的實際作用外，亦增添幾許人文氣息，準此而言，浸淫於園林之中即是浸淫在文學與文化傳統之中，故無疑具有以虛為實的園林實踐過程與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之虛實相映或虛實相濟的深刻美學效果。

而本文尋繹〈臺灣八景〉之濫觴，以為其與清初來臺宦遊文人遊覽／視察路線及臺灣園林書寫密切相關：季麒光宦臺遊覽／視察路線及其〈寓望園記〉／〈書齋八景〉書寫分別為其外緣與內因，當中，季麒光〈寓望園記〉／〈書齋八景〉與高拱乾〈澄臺記〉／〈臺灣八景〉不僅存在前後遞嬗發展之關係，而且同樣具有自然與人文的景觀與寓意，尤其甚者，中國園林可謂源於山水意識，郭熙論山水畫時即云：「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¹⁴¹準此而言所謂「三遠四可」，寓望園及其小室（書齋），乃至於後來的「澄臺」與「斐亭」，無疑都充分體現將自然山水移置到園林，甚至其本身就是園林的一部份，進而構成可行、可望、可游與可居的天地。〈書齋八景〉外部是園林的一部份或為其延伸，而內部則利用借景充分展現自然與人文

¹³⁷ [清] 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下冊，頁545。

¹³⁸ [南齊] 謝赫：《古畫品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1冊，頁1。

¹³⁹ [明] 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247。

¹⁴⁰ [清] 蔣驥：《讀畫紀聞·章法》（筆者重新標示新式標點），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12冊，頁429。

¹⁴¹ [宋]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1冊，頁497。

景觀，蓋「書齋」是書生學子含英咀華與怡養情性的場所，具有謙退幽隱的性質與藏修密處的美感，而從其所展現的煮茶、賦詩、對奕、待客……等風雅行徑及其可能陳設（列）：書籍、畫軸、題匾、楹聯……之內容來看，實與後來〈臺灣八景〉之「斐亭聽濤」佈置密切相關：觀諸范《志》之「斐亭聽濤」圖版及宦遊文人〈斐亭聽濤〉相關詩作，仍可見書齋擺設之樣貌及其所具有之人文風貌。

〈書齋八景〉是文人的一方天地，徜徉其中，可以開顏騁懷、舒嘯消憂，也可以流覽勝景——遊（假）「山」玩（假）「水」，如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造假山》云：「高低曲折隨人意，好處多從假字來」，¹⁴²又，《園冶·卷3·八·掇山》：「有真為假，做假成真」，¹⁴³擴而大之，〈臺灣八景〉則真實可遊——遊（真）「山」玩（真）「水」（弄「假」成「真」！），當中，「斐亭聽濤」大致承繼了書齋原有的位置與形貌，職是之故，由〈書齋八景〉到〈臺灣八景〉的書寫轉變，正是從「賞遊」走向「宦遊」，而具有從「封閉的山水」——帝國山水的隱喻，走向「開放的山水」——帝國山水的實際意義，尤其甚者，其更代表由士子之「學」而士大夫之「仕」的轉變歷程，故〈書齋八景〉可視為讀書人出仕宦遊前潛心讀書的風景——一闕士子出仕宦遊前的「練習曲」（study），〈臺灣八景〉則是其正式出仕宦遊途中登山臨水所見水送山迎的帝國新風景。

更進一步而言，〈書齋八景〉是寫意的「假山水」，而〈臺灣八景〉則是寫實的「真山水」，二者同時具有園林建築「移步換景」的特性，只是，〈臺灣八景〉是更大的「步移景換」，並具有開闊雄偉的崇高風格。又，〈臺灣八景〉是清代大一統時代話語中，帝國海外疆域不可或缺的新風景，此中，「東溟曉日」適成為帝國的第一道曙光，尤其甚者，〈臺灣八景〉更具有帝國新版圖的象徵性意義與宦遊新路線的實質性意義，復且，在康熙皇帝南巡治河安瀾、察吏撫民及游覽山川等語境下，更加凸顯其具有宦遊路線與職務視察的意義，準此而言，季麒光宦遊可以視為康熙南巡之延伸，不唯如此，《康熙南巡圖》與《臺灣八景圖》具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康熙南巡圖》以「咫尺山水，蘊千里江山」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之連續性山水構圖，可謂帝國江山之隱喻，而《臺灣八景圖》作為「咫尺千里」的一組圖版與詩作，則庶幾可以視為帝國一方山水橫幅或山水寫意圖。

¹⁴²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第2冊，卷25，頁9上。

¹⁴³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206。

又，雖然《康熙南巡圖》與《臺灣府志·臺灣八景圖》同樣是「帝國之眼」的產物，但二者卻呈現完全殊異的旨趣。就形式而言，前者是彩繪華麗之「卷軸」，僅供帝王個人品賞紀念與皇家珍藏之用——可以想像隨著卷軸的逐漸展開（今江南部份或已亡佚），猶如「廊引人隨，步移景異」，將使其重新體驗昔日江南園林所見之美景；後者則是黑白素樸之「版畫」，主要作為官方公開傳播與垂諸來者之用，故可以將其視為提供後來宦遊文人得以順利「按圖索驥」與「重蹈覆轍」之「宦遊指南」。就內容而言，前者藉由康熙南巡詩文重新加以「描繪」，具有「第三人稱」敘事之連續性，而以帝王威儀、玉輦船艦（南船北馬）為中心，江南山水園林則作為陪襯背景，採風問俗意味濃厚，整體而言，具有「詩中有畫」的實踐過程與「畫中有詩」的美學效果；後者則「刻畫」文人宦遊來臺沿途所見八個主要景點，其中，除了斐亭聽濤出現一人物外，其他則多只有風景，某種程度而言，可謂宦途風景之「格放」，且大抵以水驛婆娑之海洋景致為其焦點——完全符合〈澄臺記〉所稱「沙曲水匯之處」，具有「第一人稱」敘事之非連續性／斷裂性——唯似斷而實連。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兩處兼具自然與人文風景，其在空間的選擇上，借用並融入當地環境，形成內外「通」、「透」，卻又內外有別的景致，可謂完全符合中國古典園林因地制宜之特色，而此具有江南園林特色的場域，也是當下海外宦遊文人身心安頓及心靈寄託之所在。此外，「安平晚渡」應該是除了上述二景之外，臺灣八景中最重要者，堪稱是其他六處自然風景之最：「安平晚渡」位處臺江內海之中，且就臺灣八景的地理位置而言，東接「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西鄰「東溟曉日」及「西嶼落霞」，南毗「沙鯤漁火」並北眺「鹿耳春潮」，凡此，一定程度上，不僅深具「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之幅輳性意義，而且又可得見「海色峰光」。凡此，臺灣（八景）幾乎位於臺江內海之中，猶如另一種江南「水鄉澤國」的風貌。換言之，臺灣八景可謂是江南水岸風光的延伸與展現。

徵引書目

-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23 冊，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第 1 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 王建国：〈風景與心境的鏡像：日據時期新詩中的海洋書寫——以林修二之詩為例〉，《文與哲》第 18 期（2011 年 6 月），頁 655-694。
- 王國維著，施議對譯註：《人間詞話譯註》，臺北：貫雅文化，1991 年。
-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中華書局，1981 年。
- 王闈運：《湘綺樓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
- 文震亨：《長物志》第 1 冊，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硯雲甲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
- 白居易：《白香山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78 年。
- 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 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
- 李漁著，艾舒仁編次，冉云飛校點：《李漁隨筆全集》，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
- 沈有容、金雲銘著：《閩海贈言·陳第年譜》，《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 孟浩然：《孟浩然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 年。
- 季麒光撰：《東寧政事集》一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
- 季麒光撰：《蓉洲詩稿》七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
- 季麒光撰：《蓉洲文稿》四卷，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上海圖書館典藏。
- 周鍾瑄、胡建偉編：《諸羅縣志、澎湖紀略》合訂本，《臺灣文獻叢刊本》，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臺北：崇智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
- 計有功：《唐詩紀事》下冊，臺北：鼎文出版社，1978 年。

- 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范曄撰，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第6冊，臺北：中華書局，1984。
- 徐永言修，嚴繩孫、秦松齡纂：《無錫縣志》第1冊，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稿，上海圖書館藏「玉鑑堂藏書第二八一號」。
- 徐麗霞：〈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臺灣府八景」為例〉，《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編（印），2010年。
-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第2冊，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
- 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蔣毓英等修：《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郭熙：《林泉高致》，收入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出版社，2006年。
- 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連雅堂：《臺灣詩乘》，收入《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陶潛撰，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臺北：中華書局，1979年。
- 陸龜蒙：《甫里集》，收入清高宗敕纂，世界書局編輯部編：《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20冊，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黃印印輯：《江蘇省錫金識小錄（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 雷蒙·威廉斯著，王爾勃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趙一帆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
- 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第9冊，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

蔣毓英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蔣驥：《讀書紀聞》，收入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下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謝赫：《古畫品錄》，收入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第1冊，《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韓拙：《山水純全集》，收入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From Kangxi's Southern Tours to Chi
Ch'i Kuang's Official Posting——
On the Compositional Context of
Eight-Views from the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Chien-Kuo*

[Abstract]

In 1684 (23rd reign year of the Kangxi Emperor), Taiwan officially became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Empire. Chi Ch'i Kuang (1634-1702), a native of Wuxi (無錫), Jiangsu (江蘇) Province, came to Taiwan to serve as the first county magistrate of Zhuluo (諸羅). During his time in Taiwan he left behind garden writings imbued with a strong sensibility from the Jiangnan region (江南韻味). Among them, *Records of Yu Wang Garden* (寓望園記) and *Eight-View Poems from the Study* (書齋八景詩) have been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eight-view poetry tradi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i Ch'i Kuang's official tour and the itinerary he followed, while also provid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two work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external factors and internal causes that gave rise to later iterations of "eight-view" poetry in Taiwan, particularly Gao Gongqian's *Eight Views of Taiwan* (台灣八景).

Interestingly, just before and after Chi Ch'i Kuang's tour, Kangxi performed his first and second southern tours, where he stayed in Jiangnan gardens, continuously producing poetry to note his experiences. All-together, the writings that emerged from Kangxi's southern tours and the Chi Ch'i Kuang official tour are two important early-Qing routes through which to reach the poetic invocation of gardens built in the Jiangnan styl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inese gardens in Jiangnan and the Taiwanes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gardens (located, of course,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spring winds again turn south of the river green” –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the reduced territories of a nation” to “green hills and blue water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actual journeys and related writings that have produced these changes. It will probe the subtle context and possibl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Jiangnan-style garden landscape of Kangxi (found in China) and the Jiangnan-style garden landscape of Chi Chi’i Kuang (found in Taiwan), and particularly how both of these instances of garden poetics worked collectively to construct a novel interpretive space for the new political order of the Qing state.

Keywords: Kangxi Southern Tour, Chi Ch’i Kuang, Official Posting, *Eight-Views of Taiwan*, *Eight-View Poems from the Study*, Jiangnan Gardens

